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和性質

施靜菲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

【摘要】在過去，關於景德鎮元代青花瓷的研究，經常圍繞在探討青花瓷的製作工藝、鈷料和裝飾來源，或是青花瓷的國外市場、海外貿易的情況。這些課題過度被強調的結果，使得有關其他層面很少被注意，尤其是中國這個國內市場更是經常被忽略。本文將從中國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出發，來看青花瓷在中國本地市場的特點及使用情況。在文獻的缺乏，與窯址的發掘無法提供青花瓷使用的整體面貌下，本文主要的討論對象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文中除了探討出土青花瓷的特點，也進一步分析共伴出土的器物組合，希望藉此理解各類質材器物在元代物質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及相對地位。在此脈絡下，我們可清楚看到元代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和性質，青花瓷作為一新興產品，如何加入原有市場的競爭，在供給與需求的互動中找到立足點。

關鍵詞：景德鎮　青花瓷　窖藏　墓葬　梅瓶

一提到元代景德鎮的青花瓷，馬上會讓人聯想到中近東的兩大收藏，土耳其的托布卡比・沙萊博物館(The Topkapi Saray Museum)和伊朗的阿爾代比神廟(The Ardebil Shrine)所收藏的豪華青花瓷器，或是東南亞等地出土，裝飾較簡略的青花小器，想像在地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盛極一時的海上陶瓷之路，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在沿途不斷地留下標記。相較之下，中國本地的市場則很少被提及，而且從未被認爲是元代青花瓷的重要市場。然而，在中國國內考古逐漸熱絡之後，越來越多的元青花瓷在中國本地出土，使得討論元青花瓷的中國市場可行性提高。

此外，由於青花瓷對元代以後中國陶瓷的發展走向，有著深厚的影響，在過去，有關青花瓷的討論經常脫離其原有的脈絡，集中在探討青花瓷的製作工藝、鈷料和設計來源，或是青花瓷的外銷。這些課題過度被強調的結果，使得青花瓷的其它層面很少被注意，尤其是國內市場。景德鎮青花瓷在元代中後期出現後，作爲一新興產品，在當時的市場競爭中和物質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它們如何加入市場的競爭？補充或取代了哪些產品？它們在什麼脈絡下被使用？集中在哪些地方？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我們將從當時的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質生活脈絡中來討論元代景德鎮青花瓷的角色和性質。

由於文獻記載的缺乏，考古材料是我們了解上述問題的重要依據。本文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出土的青花瓷，以探討其所使用的脈絡。① 在景德鎮窯址的發掘無法提供青花瓷使用的整體面貌下，本文兩組主要的討論對象爲窖藏和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藉由比較這兩種性質不同遺址所出土的青花瓷，可以使我們了解其在當時的使用情形。此外，進一步分析共伴出土的器物組合，希望藉此理解各類質材的器物在元代物質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及它們的相對地位。

一、元代幾個重要窖藏的比較

下面我們將比較幾個元代的重要窖藏，選擇的標準在於它們相似的特點。一、這些窖藏都包含有一般設宴所使用的飲食器 (eating and drinking vessels)、盛裝器 (serving vessels) 和儲藏器 (storage vessels)。二、都有高價值的器物，珍貴的金銀器或銅器，或是高品質的陶瓷器。三、比起墓葬，出土的器物數量相對較多。然而，相較起墓葬中往往伴隨有墓誌出土，窖藏中則難得有資料來幫助我們得知窖藏擁有者的身份，更遑論其社會地位及種族，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訊息，就是出土的器物本身和窖藏的地點。在分析這些窖藏時，青花瓷將被放到器物整體的使用脈絡中，尤其是和其他明顯較貴重質材器物的組合關係。

---

① 討論中將不包括大量作爲火葬罐使用的雲南青花瓷，也不討論內蒙古黑水城生活遺址所發現的景德鎮青花瓷。雲南青花瓷爲當地所生產，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色彩，除了雲南本地，在其他地方並沒有出土，且依照目前所見的考古材料來看，不能早於明代洪武時期，故在此不列入討論。參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0-44。內蒙古黑水城經過多次的採集、考察，共發現了約600片青花破片，然而黑水城在當時處於元帝國的邊緣地帶，爲西夏的故城，筆者認爲此地所發現的青花瓷應另闢專文探討。見 John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pp. 72-74；E. Lubo-Lesnicheko,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of Yüan Period from Khara-Khoto,"《中國古代貿易陶瓷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頁461-484；〈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年7期，頁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 元代重要窖藏一覽表

瓷器：B＝藍釉　R＝紅釉　Q＝青白瓷　　金銀器:G＝銀　S＝金

C＝青瓷　UB=青花　UR=釉裏紅

J＝鈞窯　W＝白瓷　TB=孔雀藍釉

內容 / 地點	梅瓶	罐	玉壺春瓶	其他瓶類	執壺	高足杯	杯	匜	盤/碟	碗	盆/洗	勺	筷	盒	爵	觚
1.合肥																
金銀器			S9				G4 S6	S6	G6 S9	S4		S1	S55 雙	S1		
銅器											1					
2.金壇																
金銀器							S3	S1	S7	S10						
陶瓷器		UB1														
3.杭州																
陶瓷器	TB2	Q1 TB1		C1	C1	C1 W26 R1	W1		C5 W2	C5					B1	C1
銅器																壺1 尊1
其他 筆架UB1																
4.保定																
陶瓷器	UB2	UB2	UB1		UB1		W1 B1	B1	W1 B1							
5.高安																
陶瓷器	UB6 TB1	UB3 UR1	W1 C1		Q1	UB9 W9 UR2 C29		UR1	W6 C61	Q6 W12 C56 J3	C21					UBI
銅器				1				2			1					

1.合肥窖藏②

在安徽合肥發現的一處窖藏，出土了一百零二件金銀器及一銅盆(圖1)，此窖藏十分重要，不只因爲它藏有數量可觀的金銀器皿，而且在幾件器物上的銘文提供了判斷窖藏年代的重要依據。出土時，所有的器物被安放在一高大的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陶瓮內（出土時已殘破，高約90公分），上以一銅盆覆蓋。其中幾件器物刻有工匠名字、製作年代以及作坊名稱，例如「章仲英造」、「至順癸酉」（1333年）和「廬州丁鋪」等。由這些銘文，我們得知，此窖藏內的金銀器皿約製作於元代至順癸酉年的廬州地區。今天的合肥正是元代廬州路的首府，也是當地的政治經濟中心。

除了其中一件大盒子外，此窖藏出土的金銀器皿都是平素無紋，它們包含盤十五件、碗四件、筷子五十五雙、勺一只、杯十只、玉壺春瓶九件和匜六件。這些器皿很可能就是一套豪華的宴飲餐具。

此窖藏被納入討論，是因爲窖藏埋藏的內容及方式，與下一個將要討論的窖藏類似。在江蘇金壇窖藏中，珍貴的金銀器皿被放入一青花大罐中。這樣的類似性將青花瓷及金銀器拉到一塊，也正是本文討論的重點。而兩窖藏埋藏方式相較之下，金壇窖藏的青花雲龍紋罐就好比合肥窖藏中的陶瓮，都作爲收藏更珍貴物品的儲藏器。

2.金壇窖藏③

1966年在江蘇金壇發現的一處窖藏，發現了五十幾件器物，只有一件是陶瓷器，即青花雲龍紋罐（圖2），其餘皆爲銀器。出土時，青花罐上覆蓋一夾層大銀碗，所有其他銀器則被放置在青花罐內。這些銀器包括銀小碗九、銀盞三、銀盤七、銀鐲八、銀條脫二、銀錠四、銀條十二及其他散碎的銀子，此外還同出有戒指、銀匜及其他銀製器皿，但出土時已殘破。

和前述的合肥窖藏一樣，出土的多件銀器上刻有銀鋪作坊銘記或工匠名款，反映當時作坊間的競爭和銀器手工業的發達；有的銀器還記上成色和重量，例如「花銀」、「十分銀」，「盤盞壹付重伍兩肆分」。另外還有幾件值得附帶一提的作品，一件銀盤上壓印梵文，周圍還飾有一圈降魔杵，應與密宗佛教有關；還有一件陽紋人物紋盤，報告者認爲是爲元代戲曲故事「唐明皇游月宮」的一幕。而一件銀盤底心以雙勾線刻「葛華甫宅頓丘郡記」，可能是此器主人的名款；另一件同式銀盤在外底刻有阿拉伯文的回曆紀年，經譯爲回年714年，即1314年，這件紀年物爲此窖藏提供了上限，不過不能以此作爲此窖藏的

② 吳興漢，〈介紹安徽合肥發現的元代金銀器皿〉，《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2期，頁51-58。

③ 蕭夢龍，〈江蘇金壇元代青花雲龍罐窖藏〉，《文物》，1980年1期，頁5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代，因爲同出的青花罐，很明顯與倫敦大衛德基金會的至正十一年(1351)瓶在風格上一致，故此窖藏器物入藏的時代應不早於元代晚期。

這些風格迥異、不同宗教信仰的銀器之所以出現在同一窖藏，若不是窖藏主人有廣泛的興趣，那就是原屬於不同擁有者的器物，在後來被收集一起。

3.杭州窖藏④

1987年在浙江杭州市發現了一處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五十四件，其中完整器二十七件，另有銅器四件。小件器物被放在一帶蓋罐內，其餘則散在窖穴內。器物種類繁多，來自好幾個不同的窯口，其中以龍泉青瓷和景德鎮的青白、樞府瓷最多(見表1)，此外還有北方磁州窯系的孔雀藍釉瓷和山西霍窯的白瓷。

飲食器中，高足杯的數量眾多，共二十七件，其中白瓷高足杯有二十六件，幾乎占了出土瓷器的一半。而出土的青瓷盤，有類似外銷中東的折沿盤，平沿或花口沿都有(圖3)，在尺寸上雖不像外銷中東的大盤動輒40公分以上，但直徑也大約在33-35公分之間，與新安沈船出土的一些折沿青瓷盤相似。出土的兩件霍窯白瓷盤和一件白瓷杯，口沿都裝有銅釦。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單色釉瓷外，此窖藏還出土了多種彩釉、釉下彩裝飾以及釉上紅彩、金彩的作品，而這些彩釉、加彩作品多爲立件。紅釉高足杯一件，內底印雙雲龍紋，與樞府瓷有密切的關係；藍釉金彩爵杯一件，器形仿青銅爵，內外均繪金彩，杯外繪折枝梅花，杯內繪梅月紋；青花蛙形筆架水盂一件(圖4)，全器施青白釉，以青花點出雲朵、波浪、蛙的雙眼和部分的海礁；⑤孔雀藍釉梅瓶一對和帶蓋罐一件，皆上有化妝土，應爲磁州窯系的作品，其中一件梅瓶的肩上有釉下「內府」款(圖5)，⑥而帶蓋罐上則繪有紅彩花紋。

---

④桑堅信，〈杭州市發現的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9年11期，頁22-27，21。

⑤大都出土的一件青白瓷水盂，器型與此件青花器相當類似。見張寧，〈記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頁25-31，圖6-1。

⑥根據Charles Hucker的考據，元代的「內府」指的是宣徽院之下屬機構太府監，掌管皇室的寶庫。他同時指出，「內府」有時候指一正式的官方機構，但更多的時候是非官方的稱謂，通稱統治者直接控制的各式庫房，存放屬於皇室的各式寶藏和金錢。Charles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窖藏所發現的銅器，有貫耳壺一件，肩部波浪紋，腹部雲雷紋，及尊一件，雙耳、肩部模鑄雲雷紋及獸面紋。一件青瓷觚(圖6)，仿古銅器形，另有一件青瓷大花瓶，69公分高，與大衛德基金會所藏，帶泰定四年款(1327年)的青瓷花瓶相似。⑦ 這個線索也對判定此窖藏的大致年代有所幫助。

4.保定窖藏⑧

1964年在河北保定發現一處瓷器窖藏，其中出土好幾件重要的青花和青花釉裡紅瓷器，尤其在其他遺址尚未被發現之前，這幾件青花瓷一直被當成中國國內出土元青花瓷的代表。窖藏內共有六件青花瓷、兩件白瓷、三件藍釉瓷以及一些綠松石和玉料。

所有這些出土瓷器都是品質相當高的作品，可能都來自景德鎮。其中一對青花罐裝飾技法較爲特殊(圖7)，使用聯珠紋開光及鏤空貼花的技法，類似的作法在一些青白瓷器上也可見，⑨而此罐更勝一籌之處是，加上鈷藍釉及銅紅釉的彩飾，讓整個貼塑紋樣更加顯眼耀目。⑩一對青花龍紋八角梅瓶(圖8)，不論裝飾紋樣或是器型都表現俐落，八角形的器形和尖銳的稜角，都顯示出與金銀器的密切關係，同出土的玉壺春瓶和執壺，也採用這種來自金銀器的器形，執壺的長流、蓋上的鈕，與把和蓋上的繫，更增強這樣的印象(圖9)。而一起出土的樞府白瓷杯和碟，也顯露出屬於金銀器的作風(圖10)，三件藍釉器不但在器型上仿自金銀器，還上有金彩。這些現象都提醒我們，不能忽略景德鎮青花瓷

另參見趙光林，〈內府款小考〉，《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頁165-166。

⑦ 大衛德藏泰定四年款青瓷瓶及銘款全文請見Rosemary Scott,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89), p.64.

⑧〈保定市發現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2期，頁17-18,22。

⑨ 都柏林國立博物館所收藏的青白玉壺春瓶就有類似的開光鏤空裝飾，圖見《世界陶磁全集》，13冊，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1)，圖43。

⑩ 這樣的青花開光鏤空罐，在大衛德基金會的收藏中也有類似的作品。而這種鏤空的表現手法，在宋元時期的金銀器和玉器也可見到，例如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一件金飾，和江蘇無錫元代錢裕墓出土的「春水」玉飾，同類玉飾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收藏。〈南宋幕府山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3期，頁28-30；錢宗奎，〈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12期，頁52-60；《故宮文物月刊》，197期(1999)，封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金銀器的關係。

另外，青花瓷立件作品，如梅瓶、罐、玉壺春瓶和執壺配上樞府白瓷杯和碟等平面作品的組合，也值得我們注意。相較於先前的杭州窖藏，青花瓷作爲一新興產品，加入市場競爭後，似乎在立件作品上較占優勢，補充其他的彩釉作品，成爲儲藏器及盛裝器的新寵。

5.高安窖藏 ⑪

1980年，超過兩百件的器物在江西高安的一處窖藏中出土。出土的二百三十九件瓷器中，包括龍泉窯一百六十八件，景德鎮瓷六十七件，鈞窯三件，此外還有銅器四件和殘破的鐵器二件。大部分的作品器類重疊放置在窖穴內，小件器則被放入罐內。

出土的景德鎮瓷中，有十九件青花瓷和四件釉裡紅瓷。出土器類中，除了六十七件盤和七十五件碗外，高足杯是數量第三多的器類。和杭州窖藏一樣，高足杯在所有器類中數量很突出，可見在元代時，高足杯逐漸取代一般的杯類成爲重要的飲器。⑫而在總數四十九件高足杯中，有九件是青花瓷(圖11)，兩件是釉裡紅瓷。碗、盤還是以單色釉器爲主，龍泉青瓷佔了絕大多數，共有五十六件青瓷碗和六十一件青瓷盤，其中一些青瓷折沿盤，與杭州窖藏出土的青瓷盤相似。

六件青花帶蓋梅瓶(圖12)，器型高大，平均42-44公分高，帶蓋後總高約48公分左右，與保定窖藏出土的八角梅瓶高度相當(總高51.5 公分)。在這六件梅瓶的底部和蓋內分別書有墨書「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這樣的記號，使得配套的蓋和梅瓶不會有張冠李戴的狀

⑪ 劉裕黑、熊琳，〈江西高安縣發現元青花釉裡紅等瓷器窖藏〉，《文物》，1982年4期，頁58-66。

⑫ 器形較大的高足杯，口徑大似碗，如新疆霍城縣出土的一件青花高足碗，見〈新疆霍城縣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8期，頁26-31。在《事林廣記》的一幅插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器型較小的高足杯，放在僕人手持的勸盤上，作爲飲器之用，而同時較大的高足碗置於桌上，爲盛裝食物所用。圖見《事林廣記》，卷11，頁9。《事林廣記》爲陳元靚所輯，原成書於南宋末，現存版本均經後事增刪而成。本文所使用的版本爲建安椿莊至順年間(1330-1332)出版，全名爲《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況發生，而且很可能與使用的順序或分類有關。⑬ 此外還出土有一件孔雀藍釉梅瓶，根據報告書的描述，筆者判斷應該與杭州窖藏的那件類似，爲磁州窯系的梅瓶。

兩件廣口罐，與金壇窖藏的龍紋罐類似，但有荷葉蓋留存(圖13)，這種造型的廣口罐在龍泉窯青瓷中也很常見，同窖藏就出土一件龍泉青瓷荷葉蓋罐，不同之處在於青瓷蓋以菊瓣出筋的方式來裝飾，而青花瓷蓋則是以青料描繪出荷葉的葉脈，這樣的荷葉蓋罐可能與金銀器有關。⑭ 一件釉裡紅罐，器型略小於上述的青花廣口罐，腹部飾有開光花鳥紋樣，出土時口部覆以重疊的兩件銅匜。另外一件青花帶蓋大罐(圖14)，貼塑有獸耳銜環，由器蓋到器底，共有十二層的裝飾。此罐的整體器形和肩部的獸耳銜環，都將來源指向青銅器，類似的造型在青白瓷作品也可見到，⑮它們的器形可以溯自秦漢時期的青銅壺，而實際模仿的對象可能是宋元時期仿古青銅器，⑯ 或來自印行於當時的《考古圖》之類的青銅器圖錄。⑰ 一起出土的四件銅器，其中包括一件獸耳銅瓶，此外，還有一件青花瓷觚（圖15），也來自古銅器的器形，與杭州窖藏出土的青瓷觚一樣，都是窖藏組合的一部分，只是青花瓷出現後，紋飾搶眼的釉下彩繪裝飾，似乎也成爲這類產品中，極具競爭力的新選擇。

---

⑬ 這很可能是當時受過教育的人，所使用的一種排序系統，例如在《至順鎮江志》中提到，當地的書院，將圖書存放在六個書櫃上，依據經、史、子、集來分類，而每個書櫃上，按照順序貼有「禮」、「樂」、「射」、「御」、「書」、「數」等標籤。見楊積慶等人校訂，《至順鎮江志》(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438。

⑭ 如南宋福建許峻夫婦合葬墓和江蘇無錫錢裕墓出土的銀荷葉蓋罐。〈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文物》，1995年10期，頁24-25，圖4-3和6；錢宗奎，〈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12期，圖版六。

⑮ 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青白瓷雲龍紋大罐，圖見《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圖603。

⑯ 例如西漢劉勝墓出土的一件青銅壺就有類似的造型，腹部兩側也有獸首銜環。圖見《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圖32-1。

⑰ 例如《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98和103所列的獸耳銜環壺即有類似的造型。學者推測《考古圖》可能是宋元時期復古青銅器製作的重要依據。Jessica Rawson, "The Many Meaning of the Past in China", *Würzburg Series*, no.3, 未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一些青白瓷碗帶有金屬釦，而一件白瓷玉壺春瓶，腹部有以金彩塗繪的龍紋裝飾，這些附加物或裝飾，無疑地增加了這些陶瓷器的價值。因而也讓我們聯想到，此窖藏出土的梅瓶和廣口罐上裝飾帶的空白，可能是也爲了上金彩所預留的，只是出土時金彩已掉，或是礙於政府瓷器上不得描金的規定而作罷。⑱這樣的禁令在當時是否能貫徹，情形不詳，但這幾件青花瓷，相較於同出土的獸耳銜環青花大罐，以及一般常見的元青花瓷作品，在應當裝飾的地方留下極不尋常的空白，陶工爲上金彩而預留空白裝飾帶的作法，是極爲可能的。

在此窖藏中，梅瓶和罐仍是青花瓷的主力，釉裡紅瓷和其他彩釉作品也作爲儲藏器使用；青瓷和白瓷等單色釉作品，則持續它們作爲飲食器皿的優勢。相較於先前的杭州窖藏，高足杯不但是元代流行的飲器，後來加入市場競爭的釉下彩繪青花和釉裡紅瓷，憑著亮眼的紋飾，也逐漸取代部分同爲景德鎮生產的青白瓷和樞府瓷高足杯，成爲流行的飲器，這點在許多原爲樞府瓷的高足杯內底心和外部，紛紛加上青花裝飾，以及爲數不少的青花高足杯在中國國內市場的出土可以得到印證。⑲

小結：從窖藏出土情形來看青花瓷在一般生活中的使用

從這些窖藏仔細地被埋藏的情況來看可推知，這些出土器物都是窖藏主人認爲有保存價值的，值得大費周章來珍藏。合肥窖藏是一典型的例子(見圖1)，埋藏有高價值的一套金銀器組合，有杯、盤、碗、筷等飲食器及玉壺春瓶、匜、勺等盛裝器。如果將其與江西樂安出土的窖藏並列，我們會發現數量眾多並且成組的金銀器極可能是富有家庭宴客的基本配備。⑳江西樂安銀器窖藏中出土

---

⑱ 瓷器上不得描金的規定頒布於至元八年(1271年)，《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五十八，工部一，〈雜造〉，「至元八年四月二十御史臺承奉尚書省付欽奉聖旨，節該今後諸人但係磁器上並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裏遍行榜文，禁斷者，欽此」。見《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台北:故宮博物院，1972)，卷五十八，頁13a。

⑲ 除了高安窖藏外，例如河北定興窖藏出土兩件，江蘇丹徒窖藏出土六件和內蒙古赤峰大營子窖藏出土五件。見〈河北定興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年1期，頁89-94；〈江蘇丹徒元代窖藏瓷器〉，《文物》，1982年2期，頁25-27；〈內蒙赤峰大營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年5期，頁8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一百多件銀器，包括盤三十八件、杯二十只、湯匙二十二只、勺一只、筷子二十二雙、玉壺春瓶兩件等等銀器所組成。㉑

在記述北宋汴京城市生活的《東京夢華錄》中，我們看到京城上等酒樓中使用銀製飲食器皿的情形。《東京夢華錄》，卷四，〈會仙酒樓〉條：

「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付，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銀近百兩矣」。㉒

只兩人對坐喝酒，即須使用近百兩的銀餐具，盛大的宴會場合，所需要的宴飲用器之數量，更是可以想見。宴樂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環，在豪富之家更是講究。根據記載，在宋代，官府貴家備有「四司六局」。四司爲「帳設司」、「茶酒司」、「廚司」和「臺盤司」。「六局」則爲「果子局」、「密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和「排辦局」。舉凡搭設席幕、佈置場地、懸掛書畫、擺設屏風桌椅、選用合用飲食器皿、上燭點香、主持儀禮、烹煮各式菜餚、進呈時新瓜果菜蔬、服侍茶酒、清理灑掃等，都由這些各司其職的辦事人員一手包辦，而一般人家也可雇用專職的辦桌人員來辦理婚喪喜慶重大宴會。㉓

像合肥、樂安等窖藏所出土成套金銀飲食器，則是這些大型宴會的必備用器，它們被使用的實際情形，也可從有關宴樂的圖像資料窺知一二，例如陝西唐代韋洞墓宴樂圖壁畫中所描繪的景象(圖16)。在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中的合食制已經出現，㉔壁畫中央有一大餐桌，賓客圍著桌比鄰坐在長椅上，態度悠然自在，有的正在飲酒，有的端著酒杯談笑。餐桌上的描繪雖簡略，但仍可

---

⑳ 英國學者Jessica Rawson在討論唐宋金銀器窖藏時曾指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無文金銀器及樂安出土的金銀器皿很可能就是富有家庭宴客的成套用具。見Jessica Rawson,"Tombs or Hoards: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sev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A.D.," *Pots and Pans, A Colloquium on Precious Metals and Cera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6.

㉑〈江西省樂安發現窖藏銀器〉，《文物資料叢刊》，8期(1983)，頁116-120。

㉒ 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頁26。

㉓《都城紀勝》，四司六局條，同上書，頁95。

㉔ 中國的合食制大體在唐代左右開始，在此之前是採用分餐制，就像在漢代壁畫、畫像石上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看出大致的情形，食物由盤盛裝排列在餐桌正中，每位賓客面前有個人專用的杯、碟、碗及筷子，而兩旁的奴僕手端著托盤，托盤上放著酒杯，隨時準備服侍賓客。桌前有一由桌布覆蓋的小矮几，放著一花口盆或大碗，盆中有一勺，此盆中可能盛有酒，而勺則用來舀酒。這組盆與勺讓我們想起合肥窖藏出土的銅盆和銀勺，它們可能扮演相同的角色。㉕這樣的飲食習慣就與用刀叉和用手指進食的傳統大相逕庭。㉖例如在伊斯蘭文化中，雖然也是共食制，但賓客們不用筷子進食，而是用手來抓取食物，因此所使用的宴客用具主要是大盤，放置在地上的大盤盛裝著各式各樣的食物，以供賓客們享用(圖17)。

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相同的器類，在不同的脈絡及場合中，可有不同的用途。像這樣成套的飲食器，並非只能用來設宴招待賓客，也可能被用來當作供桌上爲祖先或神靈用餐所準備的餐飲器，例如河北宣化出土的遼代張文藻墓，棺床前置有供桌與成套的供器(圖18)，供器上還盛有各式供品。㉗雖然這些器形的基本功能是飲食器，在不同的脈絡下，可擔負不同的功能。

此外在較早的出土例中，像是屬於唐代的江蘇丁卯橋窖藏、屬於宋代的江蘇溧陽窖藏和四川德陽窖藏，除了金銀的飲食器和盛裝器外，梅瓶和罐等儲藏器也經常也是窖藏器物組合的一部份。㉘在前面所提到的元代窖藏中，像金壇窖藏、杭州、保定和高安窖藏，梅瓶和罐都是窖藏的基本組合，而且大多是彩釉瓷或有釉下彩繪裝飾的陶瓷器，其中青花瓷更是主要的選擇(參見表1)。在江蘇另一個元代窖藏中，所發現的三件陶瓷器，都是青花瓷儲藏器，包括帶蓋罐一件，梅瓶兩件。㉙

但青花瓷在國內市場多爲立件作品，主要被用來作爲儲藏器和盛裝器的這

見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景。王仁湘，《中國飲食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82。

㉕類似大碗與勺在元墓的壁畫中也常見，見本文圖26，27。

㉖王仁湘，同上註，頁259。

㉗〈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壁畫墓發掘〉，《文物》，1996年9期，頁14-46。

㉘〈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的唐代銀器窖藏〉，《文物》，1982年11期，頁15-27；〈四川德陽出土的宋代銀器簡介〉，《考古》，1961年11期，頁48-52；〈江蘇溧陽平橋出土宋代銀器窖藏〉，《文物》，1986年5期，頁70-77。

㉙陳世華，〈句容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東南文化》，1991年3期、4期合刊本，頁223-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特點，在與同時期同一窯址生產的樞府瓷相較下，更顯得突出。我們所見的樞府白瓷主要是碗、碟、盤等飲食器皿，立件作品非常少見，讓人不免懷疑，這兩種品種是否有分工的關係存在。在安徽歙縣發現的兩處窖藏中，就出土有百件以上的景德鎮青白瓷及樞府瓷杯、盤等成套的飲食器(圖19)，而除此之外，只發現一件殘破的青花高足杯和一件藍釉爵杯。㉚ 從表1我們對這些問題更可一目了然，同一窖藏出土，主要的飲食器具，如碗盤等，多是金銀器或高品質的白瓷及青瓷。而窖藏中出土的青花瓷，則主要用來作爲儲藏器使用，也有一部份的青花瓷爲盛裝器，而只有少數的青花瓷被用來輔助白瓷和青瓷飲食器，例如高安窖藏中的九件高足杯。而另外在安徽安慶發現的一處窖藏中，青花碟、匜各一件；㉛ 北京大都舊鼓樓大街發現的一處窖藏中，出土十件青花瓷器，包括碗四、杯二、托二、執壺一和觚一(圖 20 、 21 、 22)。㉜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元代中後期 ，儲藏器如梅瓶和罐，通常是彩瓷或釉下彩繪等裝飾顯眼的陶瓷器，這樣的情形可能與梅瓶或罐等儲藏器的性質改變有關。在之前的遼、宋、金時期，梅瓶和罐較常被放置在地上或矮几上，就像在很多同時期壁畫中可看到的情況一樣，例如四川南宋虞公著墓和遼寧金墓中的備宴圖(圖23、24)；㉝ 而在元代，梅瓶往往被放置在桌上，例如山西廣勝寺水神廟和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的壁畫(圖25、26)。㉞放置位置的改變，代表高品質的梅瓶或罐，在被當成實用的儲藏器之同時，還具有裝飾、展示的功能。而彩釉或彩繪裝飾就與這樣功能相輔相成，比起單色釉瓷或金屬器上，極不顯眼的刻畫花紋或塹刻鎏金花紋，以鈷料彩繪的醒目紋樣，很輕易就能吸引目光

㉚〈歙縣出土兩批窖藏元瓷精品〉，《文物》，1988年5期，頁85-88。

㉛ 同一窖藏還出土有哥窯杯四件、盤一件。見〈安慶出土的幾件窖藏〉，《文物》，1986年6期，頁81-82。

㉜ 此外，還有六件青白瓷一同出土。見〈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72年1期，頁24。

㉝〈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考古學報》，1985年3期，頁394；〈遼寧朝陽金代壁畫墓〉，《考古》，1962年4期，頁183，圖14。當然在元代以前，高品質的梅瓶，如金銀器梅瓶或定窯白瓷梅瓶等，也有可能被放置在桌案上展示。壁畫中偶爾也可見梅瓶放置在桌案上的例子，例如河南安陽王用墓(1077年)。〈河南文化局調查安陽天禧鎮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8期，頁145。

㉞ 廣勝寺水神廟壁畫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注意，就算從較遠處觀看，也能一目了然。並且，在中國的飲食文化當中，除了美食美器外，環境的擺設及氣氛的營造也是十分重要，這在先前所提到有關設宴的「四司」、「六局」中，場地佈置、焚香設燭等工作所占的份量就可以看出。而梅瓶或罐被賦予的裝飾功能，可能就好比在廳堂上擺設的屏風和懸掛的繪畫一樣，有著相近的效果。而事實上，很多的青花瓷就描繪著與同時代裝飾用的屏風、繪畫相同的主題，例如孔雀竹石、魚藻圖、蓮池圖等帶有吉祥意味的母題。

在一流行於元代的百科全書，《事林廣記》中的插圖(圖27)，[35] 廳堂的正中即飾有孔雀、湖石和牡丹的巨幅壁畫，同樣的主題在青花瓷上也經常可見(圖28)，一旁桌上的玉壺春瓶，也是國內出土青花瓷常見的器型(圖29)。洛陽邙山發現的宋墓中，棺台兩側雕磚上，刻畫有兩兩成對呼應的掛軸(圖30)，左側是繪有雉雞、湖石和梅竹的直軸與繪有蓮池的橫軸，相對的右側是同樣繪有蓮池的橫軸與繪有牡丹、柳樹等植物的直軸。[36] 這些母題也是在青花瓷上常見的題材，在許多青花罐上，就常有游魚優游於蓮池中的裝飾用的(圖31)。這些青花瓷器與作爲裝飾用的屏風和繪畫，有著互相呼應的相乘效果，可共同營造出充滿吉祥如意的環境。

二、墓葬出土的元代青花瓷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墓葬出土的景德鎮青花瓷，依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出土有元青花瓷的元代墓葬多集中在景德鎮鄰近的區域，但另一有趣的現象是，許多南京出土的早期明墓也有元青花瓷的發現，下面我們就要針對這兩個不同時代、類型墓葬所出土的青花瓷，放到適當的脈絡中加以探討。

圖80。元墓壁畫見〈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3期，頁137。

[35]《事林廣記》，卷七，頁61。

[36] 考古報告見〈洛陽邙山宋代壁畫墓〉，《文物》，1992年12期，頁37-51。如果我們相信墓室的雕磚或壁畫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墓主生前的生活景象，那從此墓的雕磚可讓我們了解當時這些裝飾性繪畫被使用、展示的情形。Ellen Johnston Laing也提到，此墓的雕磚是了解當時這些掛軸畫使用情形的重要證據。Ellen Johnston Laing,"A Survey of Liao Bird-and-Flower Painting," *Journal of Sung-Yüan Studies*, no.24 (1994), p.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元代墓葬與青花瓷

出土有青花瓷的元代墓葬多集中在景德鎮的鄰近地區，包含贛東北、皖東南及浙北等地，㊲而出土有青花瓷的元代窖藏則分布較廣，遍及各地，並不集中在景德鎮鄰近地區，因此我們不能將青花瓷在景德鎮鄰近地區，作爲陪葬器使用的特點視爲理所當然，而應將其看成此地區的區域特色。兩種遺址出土的青花瓷品質也相差甚遠，元墓出土的青花瓷品質屬中下，甚致粗糙，而這些墓葬也大多是等級不高，隨葬品不甚豐富的小型墓。

[表2] 元代墓葬出土的青花瓷一覽表㊳

此表顯示出土有元青花的墓葬及共伴出土的其他隨葬品

出土地點	紀年	出土的青花瓷	其他隨葬品	出　處
1 江西波陽		帶座梅瓶2 (梅瓶: H. 16.8cm) (座: H. 8.7cm)	青白瓷瓶2 青白瓷碗1 青白瓷香爐1 青瓷香爐1 瓷屋模型1	《文物》，1976年11期，頁86-87
2 江西景德鎮 (江西豐城徵集)	1338	(青花釉裡紅)罐1 (H. 22cm) (青花釉裡紅)穀倉模型 (H. 29.5cm)	紅釉俑 2	《文物》，1981年11期，頁72-74
3 江西景德鎮		帶座蒜頭瓶1 (瓶: H.16cm) (座: H.7.8cm) 帶蓋香爐1 (連蓋H.15.5cm)	不明	《江西歷史文物》， 1983年4期，頁109-114
4 江西景德鎮	1348	罐1(H. 10.5cm)	不明	《江西歷史文物》， 1983年4期，頁109-114
5 江西上饒		玉壺春瓶2 (H. 27.5 cm; 27 cm)	不明	《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66-167
6 江西景德鎮		罐1(H. 7.4cm)	不明	《景德鎮出土陶瓷》 (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頁128
7 江西九江	1351	帶座香爐1 (連座H. 10cm)	青瓷杯1 青瓷碗1 白瓷帶座瓶2 買地卷1	《文物》，1992年6期，頁94-95
8 安徽青陽		帶座瓶2 (連座 H. 26cm)	不明	《東南文化》 1993年3期，頁160-166
9 浙江杭州	1336	(青花鐵繪)觀音俑 (H.19.6 cm)	青白瓷燈座3 青白瓷香爐1 樞府瓷碗1	《中國古陶瓷研究》，4冊(1997)，頁155-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大部分的墓都有被擾亂或破壞的情形，因此很難重建完整的出土內容。不過藉由其他相關資料的輔助，我們仍能勾勒出一些元代墓葬中使用青花瓷的特點。

首先，我們發現在這些墓葬中，依照出土青花瓷的器型來看，很少有飲食器，這些墓葬中的飲食器多爲青瓷或青白瓷及白瓷(見表2)。這樣的情形與窖藏出土的青花瓷情形類似，即很少有青花瓷被用來當作飲食器皿，這樣的特點在過去很少被注意，而也提醒我們，元代景德鎮青花瓷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性質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這些墓葬出土的青花瓷以瓶、罐爲主，而其中帶座瓶和香爐也不少，相較於同出的青瓷、青白瓷飲食器來看，青花瓷作爲儲藏器和祭祀用器使用的性格很明顯。

另外如果我們將這些墓葬出土的青花瓷，與保定或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瓷加以比較，會發現品質顯然相差甚遠。在中國出土的青花瓷中，高品質的大多出現在窖藏中，並且經常伴隨高品質、高價值的陶瓷器或金屬器一同出土，而品質低的往往與其他不同材質的儀式性用器(offering vessels and altar vessels)一起用來陪葬。這種品質差別的主因可能是人們通常使用替代品或明器來陪葬，而多數的窖藏則主要是用來埋藏貴重物品的。

㊲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僅有少許的零星例子在這個地區以外發現，例如：在甘肅汪世顯家族墓群中發現有青花瓷，根據考古報告所刊出的圖版，21號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碟，應爲元青花，至於是否有其他元青花瓷在此家族墓群出土則不清楚。〈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二〉，《文物》，1982年2期，頁15，圖4-7。另外在內蒙古翁牛特旗的一座墓葬中發現一青花龍紋玉壺春瓶。〈翁特牛旗發現元青花玉壺春瓶〉，《文物》，1991年7期，頁59。

㊳ 原被報導出土於九江紀年元墓(1319年)的青花塔式蓋罐並沒有包括在此表中。〈元代青花牡丹塔式蓋罐〉，《文物》，1981年1期，頁83。主要的原因是有學者指出此罐的釉下裝飾並非青花而是鐵繪。請參見Yuba Tadanori, "Advances in Jingdezhen Research," in *In Pursuit of the Dragon* (Seattle: Seattle Museum, 1988), p.45; Liu Xinyuan, "Yuan Dynasty Official Wares from Jingdezhen," in Rosemary E. Scott ed.,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6(1993), p.37. 由於未曾親見此作品，而此罐也尚未經過科學化驗，因此將其作爲元代青花瓷的最早紀年作品，實有其可議之處，不過將其視爲景德鎮元代釉下彩繪瓷的先聲是說得通的，因爲罐上的裝飾與後來發展的青花瓷可以連接。此外，經景德鎮陶瓷歷史博物館白焜先生告知，此罐實際上是出土於江西九江對岸的湖北省境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也發現，這些墓的等級都不高，從有限的資料來看，墓主爲一般平民或低階官吏的配偶。㊴陪葬品也不多，僅出土少量的陶瓷器，沒有什麼貴重的金屬器皿或飾品。所出土的青花瓷，除了品質低外，相較於一般生活用品，器型普遍較小。例如波陽出土的青花梅瓶高16.8公分，而搭配的座僅有8.7公分高(圖32)；紀年1348年的青花罐高10.5公分(圖33)，㊵而另一件景德鎮近郊墓葬出土的小罐，僅有7.4公分；紀年1351年墓出土的帶座香爐，總高僅10公分(圖34)，另一座景德鎮附近墓葬出土的帶蓋香爐，全器高爲15.5公分(圖35)。

蔣祈在《陶記》㊶中描述景德鎮陶瓷的產銷情形時，曾提到說：

「……兩淮所宜，大率皆江、廣、閩、浙澄澤之餘。土人貨之者，謂之黃掉。黃掉者，以其色不美而在可棄之域也。所謂器之品數，大略有如此者。」㊷

雖然蔣祈所記載的可能是較早的情況(南宋或元初)，但由出土實物我們也可看到類似的情形：較上等的貨品都銷到江、廣、閩、浙等地，再次者則運銷兩淮地區，當地人所購買是被稱爲「黃掉」的末流貨品。看來相對於其他地區

㊴從九江出土1351年墓出土的買地卷來看，墓主人舒氏一小娘只是平民身份。吳水存，〈江西九江發現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92年6期，頁94。而由景德鎮出土的紀年(1338年)穀倉模型上的墓誌銘來看，墓主凌氏則爲低級官吏之家屬。見楊后禮的考證，楊后禮，〈對景德鎮元代凌氏墓出土瓷器的再認識〉，《景德鎮陶瓷》，第59、60期合刊本(1993)，頁115-116。

㊵此罐上刻有「戊子年□□」等字，因此被推測爲1348年左右的作品，根據此罐的裝飾風格來看，這樣的推測可以被接受。

㊶蔣祈的《陶記》過去一直被當成是元代的著作。參見陳萬里，〈我對「青白磁器」的看法〉，《文物》，1959年6期，頁12；馮先銘，〈我國宋元時期的青白瓷〉，《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3期，頁33；Percival David,"The T'ao Shuo and 'The Illustrations of Pottery Manufacture': a Critical Study and a Review Reviewed,"*Artibus Asiae*, vol.12(1949),pp.165-182; John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6), p.41; Margaret Medley, *Yuan Porcelain and Stonewa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p.7.然而近年來，以劉新園爲主的幾位學者提出《陶記》成書於南宋說，並輔以有力的證據，引起激烈的論戰。劉新園，〈蔣祈陶記著作時代考辨〉，《景德鎮陶瓷》，10期(1981)，頁5-35；劉新園，〈宋元時代的景德鎮稅課收入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說，當地的經濟狀況似乎較差，以致於當地人雖處於產地或本身就是製造者，卻只能用最差的貨品。然而雖然這些本地人無力購買高品質、高價值的物品，他們選擇剛開始生產的青花瓷器來陪葬，或許也暗示當地需求彩繪陶瓷的一種新風潮或傾向。

而這些墓葬中出土的粗製青花小型器，也有很可能是高價值同類器的替代品，高價值同類器如青銅器、金銀器或高品質的陶瓷器可能是在生前使用，而這些青花瓷小器則爲陪葬而製作，不過也不完全排除有生前使用後，再放入墓中陪葬的可能性存在。有一些證據可支持上述的論點，譬如它們的器型經常與銅器有關，例如九江1351年墓出土的香爐及景德鎮墓葬出土帶獅鈕蓋的香爐和蒜頭瓶，都源自古青銅器器形，㊸ 而這些原來作爲禮容器使用的青銅器型，在此時用途改變，被當成香爐和花瓶來使用。㊹ 用青花瓷製小型器陪葬的作法在此地區有所延續，許多明代的例子都在景德鎮附近的墓葬出現，例如三件一套的青花小器，包括兩件花瓶和一件香爐，高度在3到5公分之間(圖36)。另外，出土於1336年墓的青花鐵繪觀音瓷像(圖37)，也可視爲替代金屬或高品質瓷製觀音像，被放入墓中陪葬的作品。㊺

其相關制度的考察：蔣祈《陶記》著于南宋新證〉，《景德鎮方志》，1991年3期，頁5-15；熊寥，〈蔣祈陶記著于元代辨〉，《景德鎮陶瓷》，1983年4期，頁35-52,55；熊寥，〈「緒」、「經總」及其它:答曹建文〉，《景德鎮陶瓷》，1992年4期，頁35-39,34。南宋說得到數位日本學者的支持，見金沢陽對《陶記》年代爭論的回顧，金沢陽，《出光美術館紀要》，第二號(1996)，頁104-111。筆者認爲雖然《陶記》成書年代仍有爭論，但南宋說的論證較具說服力。且不論是南宋說或元代說，依據書中沒有提到青花瓷來看，《陶記》可以肯定的一定成書在青花瓷出現之前，亦即元代中期以前。

㊷ 白焜，〈宋・蔣祈《陶記》校注〉，《景德鎮陶瓷》，10期(1981)，頁40。

㊸ 蒜頭瓶爲秦漢時期的青銅器型，元代時有仿作類似器型，元代製作的青銅蒜頭瓶在新安沈船中有發現，同時一起發現的還有龍泉青瓷蒜頭瓶。見《新安海底文物》(漢城:三和出版社，1977)。此外福建地區最近發現的窖藏銅器中也有屬於元代的青銅蒜頭瓶出土。〈福建南平窖藏銅器〉，《南方文物》，1998年2期，圖一之8。

㊹ Jessica Rawson，同註⑰。

㊺ 根據同出的墓誌，紀年爲至元丙子年，立誌者爲其曾孫明安答兒。按元代有前後兩個至元年號，因此此墓的定年有待進一步資料的考證。馮先銘首先在元史卷122，找到一於癸酉年戰死在鈞州的明安答兒，他將此癸酉年對應到1313年，據此他認爲此墓不能晚於1313年，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花瓷儀式用器也可能用在家廟或宗祠的祭祀中。在江西萍鄉的一處窖藏，有二十九件器物出土，其中十件爲青花瓷，包括帶座香爐一件、兩件帶座瓶、五件小碗、一件高足杯和匜。㊻有趣的是，在帶座香爐器底無釉處有墨書「宗位」二字，此香爐與紀年1351年的香爐不論器型、尺寸和裝飾都類似；同樣的墨書也出現在一起出土的一件青花小碗和一件青瓷杯上，而在成對的帶座瓶之器底則書有「宗」字(圖38)。這幾件青花瓷尺寸也都不大，帶座香爐僅10公分高，小碗直徑約7.8 公分左右，而帶座瓶瓶高15公分，座高7.5公分。其他共同出土的器物還包括白瓷碗三件、白瓷人物騎獅俑和人物騎象俑、青瓷碟四、青瓷碗四、青瓷高足杯五、青瓷杯一、一件鐵器和七件青銅器，其中有兩件爲觚，而一青銅鐘上模塑七尊觀音像。這些器物極可能是家廟或宗祠中所使用的一組祭器。

若將此窖藏與時代可能稍早的江西宜春窖藏相比，我們會有更多的發現。宜春窖藏出土了銅器二十二件，瓷器四十七件，石器一件。其中完整的銅器十五件，包括銅盆二、多節壺四、貫耳扁壺二、獸耳銜環扁壺二、雲耳瓶二，雙耳三足爐三、獸足鼎二、缽形磬三；完整的瓷器四十一件，包括龍泉青瓷碗十、景德鎮青白瓷碗六、白瓷碗二、白瓷盤十五、乳黃釉碗十一件、吉州窯鐵繪洗一、鐵繪香爐一。㊼此窖藏出土的兩件青銅雙耳三足爐上，帶有銘文「大德癸卯年郡北祈求會新造過錫器外續置銅香爐肆個永充供養」，可證此批器物爲廟會中

應爲前至元丙子年(1276年)所葬。(馮先銘，〈有關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文物》，1980年4期，頁59)這樣的說法多年來一直被引用，而最近幾年，這個說法受到學者們的強烈質疑，尚剛重新檢視馮所引用的文獻發現，元史卷122的《槩直盾魯華傳》中的原文，「癸丑，憲宗遣(明安答兒)從昔烈門太子南伐，死於鈞州」，由此可知這裡的癸丑年並非1313年，應爲憲宗三年的癸丑年(1252)，因此馮所找到的這位明安答兒與此墓毫無關係。而依據同出的樞府瓷來看，此墓的紀年爲後至元丙子年(1336年)的可能性較高。(尚剛，〈唐元青花敘論〉，《中國文化》，9期(1994)，頁173。)陳階晉也提出相同的質疑，見陳階晉，〈元代至正型青花瓷器之研究〉，《藝術學》，16期(1996)，頁11。而在當地學者對此墓年代的重新考證下，再次確認了此墓的紀年應爲後至元丙子年（1336年）。沈芯嶼，〈關於杭州出土元青花觀音像年代的兩點考證〉，《中國古陶瓷研究》，4期(1997)，頁155-157。

㊻〈萍鄉市發現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1期，頁46-48。

㊼〈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2年2期，頁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使用的供祭器，而且由銘文紀年「大德癸卯年」(1303年)和同出的瓷器來看，此窖藏的時代約爲13世紀下半到14世紀初。青瓷、青白瓷和白瓷飲食供器與青銅祭器的組合，再加上一同出土的吉州窯鐵繪瓷立體作品，六方洗和香爐，[48] 另有一殘破的鐵繪大花瓶，瓶高不少於50公分。由此可看出當地(景德鎮鄰近地區)對彩繪陶瓷作爲花瓶、香爐等祭器的需求正逐漸加溫，而到時代略晚的萍鄉窖藏時，青花鈷藍的彩繪裝飾隨即成爲此類儀式性器具的新選擇，用來補充青銅祭器。

Margaret Medley早在70年代就注意過，元青花瓷在中國市場似乎有專爲家廟或宗祠製作用器的傾向。[49] 她的靈感顯然來自大衛德基金會所收藏，帶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象耳瓶(圖39)，但由於當時考古資料的限制，她並未做更深入的討論，而就如同我們前面看到的情形，隨著中國地區考古發現的進展，元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主要被用來當作儀式性用器的特點，越來越清楚。

這對著名的大瓶，瓶高63.6公分，器形特殊，之前的陶瓷器沒有類似的器形，此器很明顯仿自金屬器。尖銳的折角、突出的脊線和象耳銜環(環已殘破不存)，都可看出與青銅器的密切關係，雖然目前我們無法找到器形相仿的青銅實物，但類似器形的仿銅黑陶器，在前面提到過的汪世顯家族墓可以見到(圖40)，除了腹部的曲線弧度不同外，盤口、象耳銜環、高圈足等特徵都可看出兩者的關係。[50]

而根據此對青花瓷瓶上頸部的銘文：

「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里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捨香爐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謙記，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

我們可以知道，這對象耳瓶爲江西信州路玉山縣的信徒張文進所訂製，在至正十一年捐奉給江西信州路的一座道觀，除了此對花瓶外，還有一香爐，三件合成一組祭器。像這樣作爲供奉的大花瓶，較早的例子可見前述同爲大衛德基金會所藏的泰定四年款(1327年)的青瓷瓶，兩者的款識內容及模式十分接近，都爲供奉寺觀禮佛、祭神所訂製的大花瓶。這兩組作品都是六十多公分的大花瓶，但相較之下，青花瓷的作品，定更能成爲信眾們注意的焦點，至正大瓶現

---

[48] 由此六方洗的器型及器內無釉的特點來看，推測可能被當成香爐來使用。

[49]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London: Phaidon, 1976), p.178.

[50]〈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二〉，《文物》，1982年2期，頁1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雖然沒有香爐來湊成套，但我們從這對現存裝飾精美、器形高大的青花象耳瓶可以想見，這成組的祭器當時被放置在寺觀祭壇上，一定立即吸引信眾的目光。爲供奉神祇訂製大花瓶的傳統，在晚期仍有持續，傳世的幾件明代青花大瓶是很好的例證(圖41)。[51]

在一發現於四川三台的窖藏中，出土了二十四件器物，分別是青瓷瓶二、青瓷碟六、青花瓷瓶二、青花香爐一、銅香爐一、銅杯一、銅盞托一、銅鈸一、銅盆二、銅匜一、銅器座一、銅罐一、銅殘件一(可能是執壺的流)、鐵鍋一和兩件錫瓶。[52]考古報告指出，根據出土地點附近的建築遺跡和這整批銅、瓷和錫祭器的發現，此地可能爲元時期的一座寺廟遺址。這對青花瓷瓶與香爐，可能原來也是成套被使用(圖42、43)，而且它們與一同出土的銅瓶、銅香爐器形相似，青花瓷祭器可能用來補充這些銅祭器。

元代時，南北的喪葬習俗有顯著的差別，在北方，宋金以來的壁畫傳統仍有保留，除了陪葬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外，北方人還喜用黑陶所製成的各式器用來陪葬，而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模仿古銅禮器的黑陶器出現在墓葬中，[53]在洛陽發現的賽因赤答乎墓就是一個精采的例子。蒙古人賽因赤答乎(Sainjadaku)被葬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在他的墓中發現成群的仿古銅禮器黑陶作品，共五十八件(圖44)。[54]另外在甘肅的汪世顯家族墓群中，不只出土有仿古銅禮器的黑陶器，也有青銅的作品。[55]雖然與此同時期的南方瓷窯包括

---

[51] 紀年的例子可見大衛德收藏的一件明代青花花瓶，頸上有與至正十一年瓶類似的銘文，紀年1496年，而在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及巴黎的奇美博物館也藏有類似，但不帶銘的花瓶。見Rose Kerr, "Object of the Month," *Orientation*, vol.18, no.3 (1987), pp.43-44.

[52]〈三台出土元代窖藏〉，《四川文物》，1993年6期，頁62-65。

[53] 北方的黑陶器在元代之前的遺址就可見到，在遼金時期它們的器形也經常仿銅器，但多爲實用器，仿古銅禮器的器形則要到12、13世紀才出現。相關的討論可見Rose Kerr,"The Evolution of Bronze Style in the Jin,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Oriental Art*, vol. xxviii, no.2 (1982), pp.146-158;Jessica Rawson,同註[17].南宋仿古銅禮器的瓷器製作，參見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眞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15卷第2期(1997)，頁83-95。

[54]〈元賽因赤答忽墓的發掘〉，《文物》，1996年2期，頁22-33。

[55]〈甘肅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葬：簡報之二〉，《文物》，1982年2期，頁1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景德鎮也有許多仿古銅禮器的作品，例如前面所見，青花仿銅器器形的作品，但相較之下，這些黑陶作品在表現上似乎更接近古銅禮器。[56]至於這些仿銅禮器的北方黑陶器在當時如何被使用，在墓葬中所扮演的角色爲何，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而宋元時期的南方，除了陪葬一般日用生活器皿外，還流行用一些特殊器型或穀倉模型來陪葬。例如，在江西地區，從北宋開始一直持續到元代，都有用所謂的「日月瓶」來陪葬的習俗(圖45)。[57]日月瓶通常成對出現，上面堆塑各種仙道人物及四神，蓋上有立鳥，頸上經常可見日和月的貼塑，因此被稱爲日月瓶，也有人直接稱它們爲堆塑瓶，但爲了與其他地區的堆塑瓶作區別，似乎稱之爲日月瓶較適當。[58]五管瓶流行於浙江地區，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堆塑瓶則流行於湖南、福建、兩廣一帶。[59]這些特製陪葬器的用途，主要是作爲儲存酒水或米糧的明器，放入墓中以供墓主在死後世界享用。幾件日月瓶和五管瓶上，都有銘文可印證這樣的推測，[60]在有些出土的日月瓶內還發現有稻穀的

---

[56] 南方瓷窯仿古銅器器型的作品在四川的宋元窖藏很常見，可參見遂寧窖藏出土的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白瓷。〈四川遂寧市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頁4-31。

[57]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大部分的日月瓶都是青白瓷，且多發現於兩宋的墓葬，元代也有零星的例子。明墓出土的日月瓶甚少見，且多爲青瓷。見〈江西玉山、臨川和永修縣明墓〉，《考古》，1973年5期，頁287-288；彭適凡編，《中國古陶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圖254。

[58] 關於日月瓶發展的整理及相關研究請參見楊后禮，〈江西宋元紀年墓出土堆塑長頸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1期，頁87-95。富田哲雄，〈宋、元の日月壺について〉，《東洋陶磁》，1990 91-92，頁135-186。

[59] 陳定榮，〈堆塑瓶論〉，《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2期，頁91-101；長谷部樂爾，〈褐釉裝飾壺とその周邊〉，《大和文華》，54期(1971)，頁18-23。

[60] 根據龜井明德針對帶有元豐三年(1080年)銘文的一對五管瓶和長頸瓶的考察，它們的用途主要是墓葬中盛酒的儲藏器。龜井明德，〈元豐三年銘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大和文華》，91期(1994)，頁1-11。浙江龍泉博物館收藏的一青瓷五管瓶蓋內墨書：「張氏五娘五谷倉柜上應天宮下應地中蔭子益孫長命富貴」，圖見朱伯謙主編，《龍泉窯青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圖56和61-2(圖61-2應爲圖56青瓷五管瓶之底與蓋，但被錯置爲圖61之底和蓋。感謝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告知)。江西南昌博物館收藏的一對日月瓶，刻有「東倉」、「西庫」的字樣，見陳定榮，前引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遺存。[61] 關於陪葬穀倉和酒水儲藏器的這個議題，下面會再談到。

而青花瓷作爲特製陪葬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景德鎮地區墓葬出土，1338年紀年墓所出土的青花釉裡紅四神罐和穀倉模型(圖46、47)。這兩件作品上面的銘文明顯顯示，它們是特別被訂製的陪葬品，而且無論在裝飾內容或功能上，它們都可與較早的日月瓶作一聯繫。青花釉裏紅罐上堆塑的四神，是日月瓶上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青花釉裏紅穀倉模型上的銘文「五穀倉所」(圖48)，更是明白點出它在墓中作爲穀倉之用途。此外，此青花釉裡紅四神罐的形式及可能的功能，也與較早的一些陪葬罐類有關。四神本身就是日月瓶上堆塑最常見的圖像，又出土於湖北紀年元墓(1319年)的鐵繪或青花罐(圖49)，在整體風格上，如器型、塔式蓋和腹部的動物堆塑，都與前述的青花釉裡紅四神罐可相連繫，而此件塔式蓋罐，在罐型和寶塔蓋與較早的青白瓷陪葬罐也有一定的關係(圖50)，[62]這樣的青白瓷罐又可視爲青白瓷日月瓶的簡化型或一個變形。這些作品，不只在形式上有借用的關係，在功能上應該也有相通之處。在日月瓶及與其相關的陪葬罐類逐漸沒落的同時，景德鎮此時期出現的釉下彩繪瓷器可能某種程度上接續了此一傳統，裝飾有鐵繪或青花的酒水儲藏器和穀倉，作爲新興的陪葬器，在此地區的墓葬中被使用。

綜上所述，景德鎮鄰近區域爲元代墓葬出土青花瓷的集中地區，而此地區所發現的青花瓷，最大的特點在作爲陪葬器或寺廟和祠堂中的祭祀用器，青花瓷往往被當成銅祭器的補充品或陪葬用的廉價替代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彩繪陶瓷似乎成爲此地區在宗教或葬俗用器的新寵。

2. 早期明墓出土的元青花瓷

另一個時常出現元青花瓷的遺址，爲明代早期的王公貴族墓，這些墓集中在當時的首都南京附近。這些墓出土的青花瓷的性質與品質，與上述元墓的情況相差甚遠。它們隨葬品豐富，且大多伴隨有墓誌，因此墓主身份和埋葬的時

---

[61] 例如〈江西南昌朱姑橋元墓〉，《考古》，1963年10期，頁576，572；萬良田，〈江西豐城縣出土宋代稻穀〉，《農業考古》，1963年10期，頁112。

[62] 長谷川祥子在其探討景德鎮青花瓷起源的文章中，也提到此件塔式罐與青白瓷堆塑罐在風格上的連接。請見長谷川祥子，〈元(至正)様式の青花磁誕生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東洋陶磁》，28期(1999)，頁7-8，圖1-37、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都很清楚，大部分的墓主是明朝的開國功臣或眷屬，擁有極高的爵位。例如汪興祖被封爲東勝侯，[63] 湯和爲東甌王，[64] 沐英爲黔寧王，[65] 沐晟爲定遠王，[66] 宋晟爲西寧侯。[67] 而且他們與皇族常有聯姻關係，例如湯和的兩個女兒嫁給洪武皇帝的第十子朱檀，[68] 宋晟之子宋琥、宋瑛分別娶安成公主、咸寧公主爲妻。[69]

在這些墓中，常出有整套的飲食器和盛裝器，如碗、盤、杯、高足杯、玉壺春瓶等，大都是由金屬器所製，以錫器最常見，其次是銀或銅器，特殊的是很多墓都伴隨有一件元代的青花瓷，而且這些青花瓷主要是器形高大(都是40公分以上)、品質較高的梅瓶或罐(見表3)(圖51、52)。

[表3]明代早期墓葬出土的元青花瓷一覽

此表按照時代順序列出出土元青花的明代早期墓葬出土地點、墓主姓名、紀年和所出土青花瓷的器型及大小。

地　點	墓　主	紀年	出土的青瓷花	出　處
南京	汪興祖(東勝侯)	1371	高足杯1 H11.1cm D12.9cm	《考古》，1972年4期，頁31-33
南京	俞通源	1389	罐1(破片)	《景德鎮陶瓷》，第59、60期，合刊本(1993)，頁66，表1
南京	沐英(黔寧王)	1392	梅瓶1 H44.1cm	《考古》1960年9期，圖見《景德鎮民間青花瓷》(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1
安徽蚌埠	湯和(東甌王)	1395	罐1 H47.5cm(含蓋)	《文物》，1977年2期，頁35-39
南京	王氏(蕭指揮使之妻)	1410	梅瓶1 H40cm	《南方文物》，1997年1期，頁29-32
南京	葉氏(宋晟之妻)	1418	碗1 H13cm D30cm	《考古》，1962年9期，頁470-478
南京	沐晟(定遠王)	1439	梅瓶1 H41cm	《考古》，1960年9期，頁31-35
江蘇淮安	陶升	1470	罐1 H43.5cm(含蓋)	《文物》，1991年7期，頁51

[63] 傳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3883。

[64]《明史》，同上註，頁3751-3756。

[65] 沐英爲洪武皇帝的養子，傳見《明史》，同註[63]，頁3756-3767。

[66]《明史》，同註[63]，頁3760-3762。

[67]《明史》，同註[63]，頁4245-4247。

[68]《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1966)，卷172，頁4b及卷183，頁1b。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青花瓷外，在其他明代早期墓葬中，也出土有釉裡紅或白瓷的梅瓶和大罐，都是高品質的儲藏器。例如海國公吳禎墓(1379年)的白瓷梅瓶，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墓(1389年)出土的白瓷梅瓶和罐，宋琥妻安成公主墓(1443年)出土的釉裡紅梅瓶(圖53)和宋鉉妻唐氏墓(1448年)出土的釉裡紅梅瓶。⑦⓪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元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主要作爲儲藏器的特點，不論是在元代窖藏或元到明早期墓葬中所發現的青花瓷，儲藏器占絕對多數。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品質較高，而集中在景德鎮鄰近的元墓出土的青花瓷則器型小、裝飾簡單且製作簡略。這顯然是與墓葬的等級有關，因爲這些明初墓都是王公貴族墓，而景德鎮鄰近的元墓，則多屬於一般平民或低級官吏之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墓葬中使用高品質的大器，而不像前述元墓般，使用特製明器或金屬器的簡略替代品，顯示出在明初墓葬中，元青花瓷的使用有了新的發展。

洪武年間(1368-1398年)，政府頒定了一套品官葬儀的規定，依據此規則，公侯陪葬用明器九十事。⑦① 至於具體是哪九十事，則可在明實錄中洪武皇帝賜葬開國功臣常遇春的記載中得到提示。常遇春是明朝開國功臣，洪武二年：

「庚午，葬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於鐘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幕中，其明器鉦二、鼓四、紅拂旗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一、弓二、箭三、竈釜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水罐、甲頭盌、臺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爐各一、燭臺二、香合、香匙各一、香筯二、香匙筯瓶、茶鐘、茶盞各一，筯二、匙一、匙筯瓶一、椀二、楪十二、盞二以上俱以錫造金裹之；班劍、牙杖各一、金裹立爪、骨朵戟、響節各二、交椅、腳踏、馬杌各一、誕馬六、槍劍、斧、弩、倉、桌、床、屏風、拄杖、箱、交床、香卓各一、橛二，以上俱以木爲之；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人、青龍、白虎、朱

---

⑥⑨《明史》，同註⑥③，頁4246-4247。

⑦⓪〈南京明代發現吳禎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9期，頁35-41；〈發掘明朱檀墓紀實〉，《文物》，1972年5期，頁25-36；〈東善橋娘娘墳發現宣德瓷〉，《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10期，頁81；〈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7年1期，頁29-32。

⑦①《明史》，志三十六，禮十四，喪葬之制：「洪武五年定。…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見《明史》，同註⑥③，頁14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雀、玄武神四人、門神二人、武士十人，並以木造，其高一尺；雜物罌六、壁一笥、楎椸、衿鞶各一；苞二、箕二、糧漿餅二、油瓶一；紗廚煖帳各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⑫

公侯陪葬用的明器九十事所列出的陪葬品包含木製的人俑、武器和傢具，錫製塗金的各式生活用具，以及絲織品等等幾大類。從考古實物的發掘來看，明初這些高級墓葬的陪葬品，或多或少都循著這樣的模式。此外玉帶、個人身上的裝飾用品以及收藏品也往往是陪葬品的一部份，例如在朱檀的墓中葬入了他個人的書畫收藏，汪興祖和宋晟夫婦墓中，陪葬有生前所使用的高級陶瓷飲食器皿。

考察明墓的葬制的幾個主要源頭，我們發現：(1)數量眾多，排列成對的文官、武士、儀仗、樂人、僕役和馬俑可回溯到唐、五代時期，⑬這些爲取代生前的隨從侍衛而製作的人俑，與宋代南方地區專門用來陪葬的一些仙道神獸俑有很大的差距。⑭(2)木製或陶製的傢具模型可能來自北方的傳統，因爲在金、元時期的墓葬時常可見。⑮(3)而成套的錫製生活用器可能承自宋元時期陪葬的成套金銀器或銅、漆器所製的生活用具，例如張同之夫婦、史繩祖夫婦、馬紹庭夫婦合葬墓等。⑯此外在張同之和史繩祖墓中都有銀梅瓶，與其他貴重器皿一起被用來陪葬。然而在明墓的例子中，這些生前使用的貴重金銀器皿卻大多

---

⑫《明太祖實錄》，同註 ⑱，卷 46，頁 912-913。

⑬關於唐到宋代喪葬習俗的主要發展趨勢請見 Jessica Rawson, 1996, pp.23-44. 雖然一些北方的元代墓葬也可見一些黑陶的騎馬俑和著蒙古人裝扮的僕役俑，但數量少且與此傳統似無關係。元墓的例子可見〈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文博》，1988 年 2 期，頁 3-6。

⑭例如一些江西宋墓所出土的各式俑，〈江西南豐縣桑田宋墓〉，《考古》，1988 年 4 期，頁 318-328；〈江西臨川縣宋墓〉，《考古》，1988 年 4 期，頁 329-334。

⑮例如山西大同出土的幾座墓葬，木製或黑陶傢具模型都在陪葬品的行列中。〈山西大同東郊元代崔瑩李氏墓〉，《文物》，1987 年 6 期，頁 87-90；〈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 4 期，頁 1-13；〈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眞、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1962 年 10 期，頁 34-46；關於金墓出土的傢具模型，也可參見 Ellen Johnston Laing, "Chin 'Tartar' Dynasty (1115-1234) Material Culture," *Artibus Asiae*, vol.XLIX (1988/89), pp.78-81。

⑯〈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 年 4 期，頁 59-66，55；〈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 年 11 期，頁 1004-1010，1018；〈合肥北宋馬紹庭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錫明器所取代，伴隨錫明器一同出土的高大青花、釉裡紅和白瓷梅瓶或罐，在墓葬的陪葬品中是相當的突出。

明早期墓葬出土的青花梅瓶和大罐，在此有兩個主要的特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梅瓶和大罐似乎是這些明初墓葬基本組合的一部份；其次，大部分的這些梅瓶和罐用的是前代的瓷器，它們角色的突出不只在於使用古董，也在它們本身是高品質瓷器，尤其是相較於可能爲陪葬而特別製作的金屬或陶生活用品模型以及陶、木俑等。

陪葬儲藏糧食、飲料和錢財的傳統，在中國長久以來就一直存在，至遲在漢代，我們就可以看到陪葬陶倉和酒水儲藏器的例子。⑰ 雖然隨著時代的變化和地域的不同，實際的形式和方式或有差別，但作爲陪葬的錢財、糧食和酒水儲藏器的性質都是相通的，除了建築物模型仿倉庫外，常見的爲各種形式的瓶和罐，儲放糧食或錢財的，一般被統稱爲倉、庫；而儲放酒水的則稱爲糧罌(甕)瓶、糧漿瓶等。在許多例子中，很多實物，如稻穀、錢幣、酒水，在這些儲藏器中被發現。而沒有實物的例子，可能是日久腐壞不存，或人們認爲儲藏器本身就可以代表、執行這樣的功能和作用。根據《大漢原陵祕葬經》的記載，在墓葬中必需陪葬所謂的「五穀倉」和「三漿水」，以飫亡魂。⑱ 藉著這樣的動作，生者對逝去的人表達他們的關心，希望逝者在死後有充裕的物質生活，不虞匱乏，而希望藉此也能保證後代繁盛、子孫富貴，就如景德鎮出土穀倉模型上之對聯所示：「禾黍豐而倉廩實，子孫盛而福祿崇」，橫聯爲「南山寶象庄五穀之倉」(圖54)，和前述浙江五管瓶上的銘文都存在這樣的期望。⑲

在明代初期的墓葬，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前面提過的朱檀墓中，就出土一對白瓷刻花龍紋梅瓶和廣口罐(圖55)(從紋飾和材質來看，兩者應是一套)，

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頁26-38，70。

⑰ 例如在湖北江陵鳳凰山的西漢墓中，發現有陶倉模型，內有稻穀，一附有五口袋的布囊也裝穀類，竹製的盛裝器中裝有各種熟食；另外，在陪葬品的清冊中，列有「漿罌」二、「酒罌」二等酒水儲藏器，可以對應到墓中出土的幾件罐形器。〈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10期，頁31-35,50。

⑱ 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考古》，1963年2期，頁94-95。

⑲ 參見註⑤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瓶中有酒，而罐內裝有各種食物包括米、肉類、蔬菜、梨、棗和蛋等。[80]由此來看，這些早期明墓出土的梅瓶或大罐，應該是糧食和酒水的儲藏器，爲墓主人提供源源不絕的糧食和飲料。在其他的明墓中，也發現很多將穀物放入罐類容器的例子，例如成都的陳氏家族墓，其中一墓的棺木後方，發現一對低溫綠釉罐，內裝有稻穀；[81]在江西地區明晚期的數個皇室宗室墓中，成對的青花或青瓷瓶中都裝有禾黍。[82]此外，謝明良還注意到，用成套陶瓷罐陪葬是明代中期墓葬中普遍的現象，並舉出在貴州發現的一明墓中，五種不同穀物被發現分別裝在五個陶瓷罐中的例子，推測這也就是所謂的「五穀倉」。[83]

其實學者們對於明初墓出土梅瓶的特殊性早已注意，也做過一些推測，例如孔繁峙認爲，明朝的皇族和皇親國戚墓葬中使用梅瓶是統治者專門使用的一種「風水瓶」，而數量的差別則是等級制度在喪葬上的體現。[84]張浦生也認爲明墓隨葬梅瓶自有其特殊的定制，皇帝陪葬四件、皇后兩件、公侯一件。[85]但是兩者對於各自的主張，都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這些梅瓶的實質意義仍不得其解，而且這些定制看來並不十分吻合實際的出土情形。

然而從上述朱檀墓的例子來看，明初墓所出土的這些梅瓶或大罐很可能也就是洪武皇帝賜給常遇春「明器九十事」清單中所謂的「糧漿缾」。[86]而這些梅瓶或大罐屬於皇帝所賞賜的各式喪葬所需品中的可能性也頗高。[87]並且，在

---

[80]〈發掘明朱檀墓紀實〉，《文物》，1972年5期，頁31。

[81]〈寶成鐵路修築工程中發現的文物簡介〉，《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3期，頁10-34。

[82]〈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2期，頁56-64。

[83] Hsieh Ming-liang, "Some Issues Related to Chinese Ceramics of the 15th Century,"《美術史研究集刊》，7期(1999)，頁45-46。

[84]孔繁峙，〈試談明墓隨葬梅瓶的使用制度〉，《文物》，1985年12期，頁90-91。此外孔繁峙認爲這些梅瓶和儲藏器無關，這點從筆者上文的推論來看似有檢討的必要。

[85]張浦生，〈南京明故宮出土陶瓷綜述：兼析南京明功臣墓出土瓷器珍品〉，《朱明遺萃》〈南京、香港:南京博物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6〉，頁13-15。在此必需說明的是，張浦生主張這些明墓出土的至正型青花，並非元代青花，而是洪武時期的至正型青花，對此，筆者持不同的意見。

[86]筆者在1998年至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拜訪劉新園先生時，劉先生也認爲明初墓出土的元青花梅瓶爲所謂的「糧漿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洪武皇帝和他身邊的眾多開國功臣出身的安徽地區，也有這樣的傳統，在一些明代以前的墓葬屢有所見。例如在安徽合肥發現的馬紹庭夫婦合葬墓(葬於1118年)中，在兩棺前各放置一件低溫鉛釉帶蓋罐(罐式類梅瓶)(圖56)，而根據報告指出，在梅瓶內發現有透明的液體，可能就是酒。[88]在安徽安慶發現的范文虎夫妻合葬墓(1305年)中，在男墓主的墓室內置有一青瓷罐(高34公分)，報告也指出有液體留存其中。[89]在此地區用梅瓶或大罐裝盛酒水陪葬的習俗，可能爲明代的這些開國功臣、貴族所沿襲。

此外，雖然因爲盜掘或擾亂，讓我們無法重建明初墓中梅瓶或大罐的放置位置，但是在明代中晚期的例子中，我們發現梅瓶的位置和棺木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在四川成都發現的一正統年間墓葬(1510年)，墓主魏存敬原是在蜀王宮任職的宦官，墓中兩件黑陶帶蓋梅瓶，被放置在棺木的兩側(圖57)。[90]在萬曆皇帝與其后妃的合葬墓定陵，共發現梅瓶八件，萬曆的棺木兩側各放有一對梅瓶(圖58)；孝端后和孝靖后的的棺木兩側，也各放有一件梅瓶。[91]由這些墓葬的例子看來，梅瓶的位置和棺木有一定的關連，而且當梅瓶成對出現時，還依照對稱的邏輯來安放。這樣的特點，在其他更早的例子中，也可發現，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安徽合肥馬紹庭夫婦合葬墓(1118年)，幾乎所有的陪葬品都放在棺木內，在棺前則各放一件低溫釉陶罐(罐式類梅瓶)，兩者成對(圖59)；[92]在江西瑞昌發現的一座南宋墓中(1257年)，一對磁州窯系的鐵繪梅瓶被放置在墓室後方，棺木的後面(圖60)。[93]由此可推測這些梅瓶或罐在墓葬中，除了作爲酒水儲藏器的基本功能外，可能還擔負有特殊的儀式性功能。[94]

---

[87]事實上，皇帝賜葬王公大臣的記載在文獻中是屢見不鮮，例如前述洪武皇帝賜葬常遇春，又如吳禎的墓誌銘所記：「喪事所需，皆由官給之」，〈南京明代發現吳禎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9期，頁38。

[88]〈合肥北宋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頁28。

[89]〈安徽棋盤山發現的元墓介紹〉，《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5期，頁55。不過這些液體，也不見得是埋葬之時倒入的，不排除有地下水滲透的可能。

[90]〈成都白馬寺第六號明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0期，頁43，圖17。

[91]見《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92]〈合肥北宋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頁26-38，70。

[93]〈江西瑞昌宋墓出土磁州窯系磁瓶〉，《文物》，1987年8期，頁8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姑且不論這樣的傳統如何形成和傳承，還是無法解釋爲何明初的高級墓要使用前代的青花瓷來陪葬。我們也不能忘記，正統八年(1443年)的安成公主墓和正統十三年的(1448年)宋琥妻唐氏墓也用先前洪武時期(1368-1398)的釉裡紅梅瓶來陪葬。我們之前已經提過，這批梅瓶和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只在於它們的高品質和高大器型，相較於其他同出的陪葬明器模型，十分的突出，而也在於它們本身是古董，相對來說比起當代的器物要來得珍貴難得。它們在明初墓葬中的特殊角色，說明了這些前代的釉下彩繪瓷器，受到以皇帝爲首的新興貴族集團的喜愛和重視，[95]表現在墓葬中，青花瓷可能與梅瓶和罐在明墓中的特殊功能相應和。

三、元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與性質

1. 與金屬器的組合使用和密切關係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看過，陶瓷器和金屬器在窖藏中並列的情形，例如金壇、杭州、高安、三台和萍鄉窖藏，類似的情況在墓葬中也可見。這些說明了當時陶瓷器和金屬器被混用的情形。而且，所發現的陶瓷器也許多模仿金銀器或銅器的器形，或是使用描金的裝飾，有的還在口沿裝有金屬扣。這些都提醒我們不能忽視陶瓷和金屬器之間所存在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元青花瓷在剛開始生產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元青花瓷在器型和裝飾紋樣上的發展。就像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古銅器器形在宋金時期爲當時工藝品所採用，對南方瓷窯的發展時有啓發，[96]青花瓷也在此發展脈絡下，承繼了這樣的潮流

---

[94] 而上面提到明代墓葬中用成套的青花或陶罐來陪葬的葬俗，謝明良也指出這些成套的陶瓷罐在墓葬中也經常有特殊的安排。Hsieh Ming-liang，同註[83]，p.45。例如在廣東發現的一些明墓，五個青花罐或陶罐成一字形排列方式。〈廣東東莞羅亨信家族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11期，頁43-50。此外，在更早的例子中，也有類似的發現，例如在山西大同發現的一座紀年墓(1190年)中，五件盛有穀物的白瓷罐成一字排開在一屏風後面。〈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頁1-13。這些特殊排列方式背後的眞正用意，以及陪葬用的梅瓶或罐在基本儲藏功能外的特殊作用，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95] 南京明故宮遺址也發現有元青花瓷的破片，圖見《朱明遺萃》，同註[85]，頁34。

[96] Jessica Rawson，同註[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爐和花瓶等祭祀用器都模仿古銅禮器的器形。而與此同時，青花瓷也模仿金銀器器形，尤其表現在飲食器和盛裝器上。

2．裝飾的價值

從分析窖藏和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來看，我們發現當時的飲食器主要是金銀器和高級的青瓷、白瓷。而當時新興的產品青花瓷，卻很少被用來作爲飲食器，青花瓷主要被用來作爲儲藏器或盛裝器使用。當時的人或許很清楚地認爲不同質材的器物適合不同的用途。金銀器和青瓷、白瓷被認爲非常適合飲食之用；而彩釉瓷或新興的青花、釉裡紅瓷，似乎恰如其分得用來裝飾，因爲它們的色彩或文樣非常顯著，而它們通常裝飾著與同時代的繪畫和屏風相同的母題。裝飾繁複、精緻的青花梅瓶、大罐和玉壺春瓶，在富豪之家中，除了作爲儲藏器或盛裝器的基本功能外，也被賦予裝飾的價值，同時具有展示的作用。在中國國內市場也常見的高足杯，高足上的碗或杯外部，也是極適合加上裝飾之處。放在寺廟祭台上的花瓶或香爐，如大衛德的至正瓶，也是格外地適合用來展示，因爲它們的高大尺寸和亮眼的裝飾，一定立即吸引信徒們的目光。

3．相對的階級

另一方面，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主要被用來作爲儲藏器或盛裝器使用，可能也顯示其在當時，與其它材質或其他品類瓷器的相對階級。在所有的器物當中，飲食器和使用者是最靠近的，使用者用嘴巴直接接觸杯、碗等飲食器，用手去拿著它們，自然會期待它們有較高的品質。如果我們眞的認爲飲食器在位階上高於盛裝器，而盛裝器又高於儲藏器，因爲儲藏器通常被放在廚房或倉庫，奴僕才會經常與它們接觸，而主人很少會親自接觸到它們。我們就必需同意，當時的青花瓷在位階上，可能相對上略低於金銀器和高品質的青瓷、白瓷。而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金壇窖藏，銀碗、銀盞等器被放置在一青花瓷罐中，厚重的青花瓷罐被當作收藏金銀器的容器，以保護這些較貴重的金銀飲食器皿，就如同合肥窖藏中粗製陶瓮所起的作用。[97]

不過話雖如此，在北方的出土例中，我們看到青花瓷的位階相對上要高於

---

[97] 在浙江永嘉發現的一處銀器窖藏，磁州窯系的鐵繪蓋罐，也被用來當作外容器，收藏銀碗、銀首飾等貴重物件。〈浙江永嘉發現宋代窖藏銀器〉，《文物》，1984年5期，頁82-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磁州窯系的作品。雖然元青花瓷在北方出土不多，但就器型而言，有許多可能被當成飲食器皿或盛裝器使用，而同時出土的儲藏器則多爲磁州窯系的梅瓶和罐。[98]

4．區域性的特殊功能

考古資料顯示，青花瓷和墓葬的關聯是很地方性的，在江西附近地區，青花瓷的早期發展與當地的葬俗有緊密的關係。首先是一些模仿銅器的明器或祭器在此地的墓葬和窖藏中頻頻出現，其次我們看到青花瓷逐漸取代日月瓶在此地區的角色，繼續在墓葬中作爲糧食和酒水的儲藏器。使用青花瓷作爲寺廟或家祠中的祭祀供器，也是由此地區發展出來的，就像大衛德的至正瓶和其他晚期的例子上所見。青花彩繪紋樣易引人注意的特點，也許是補充青銅器作爲祭器的有利之處，而當地對彩繪瓷器的需求，和在宗教脈絡和葬俗的新興發展，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青花儲藏器在明初墓葬的使用，或許可看成青花瓷作爲陪葬用器傳統的延伸，但是高品質的青花瓷梅瓶和大罐，在明初墓葬的突出角色顯示，青花瓷器定受到以皇帝爲首之新興貴族集團的青睞，而除了作爲墓葬中糧食和酒水的儲藏器外，可能在葬俗中還擔負特殊的儀式作用。

四、結論

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很清楚看到，一個新興產品，在生產與需求的互動下，各種不同品質等級的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幾個特定的脈絡中被使用。可媲美中近東收藏的高品質作品在保定、高安等窖藏中屢屢可見，大衛德基金會至正十一年款的大瓶更是這類作品的典型例子；大都出土的幾件作品可作爲中等品級的代表(圖20-22)；景德鎮鄰近地區墓葬出土的青花小器，品質則較爲低下。而相較於中東地區以收藏或出土大盤爲主、瓶的情況，中國出土的青花瓷器以立件爲主，梅瓶、罐類是最主要的出土品，若加上收藏品一起來看，玉壺春瓶和高足杯也不少；碗、盤類作品雖然也存在，但整體比例上不若中東市場的突出，而且器形普遍較小，40公分以上的大盤非常少見。[99]祭祀和特殊陪葬

---

[98] 李知宴，〈故宮元代皇宮地下出土陶瓷資料初探〉，《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8期(1986)，頁73-78，35；〈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72年1期，頁19-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器則是中國市場特有，中國以外地區很少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產品帶有強烈的區域性，流行於產地景德鎮鄰近地區。

最後必需強調的是，環繞著元青花瓷的特殊光芒，即青花瓷在初創階段引人爭議的各項話題，如起源問題、裝飾紋樣、陶瓷貿易等等，往往掩蓋了我們對其他層面作深入探討，也妨礙我們以客觀的態度去了解青花瓷在與整個市場和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而實際上，青花瓷在開始生產時，產量僅占景德鎮其他產品生產總量的一小部分，⑩④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相較於其他的陶瓷產品，也仍在開創階段，所占據的市場十分有限。換句話說，14世紀時，青花瓷作爲一新興產品，在中國這個國內市場尚未被廣泛接受，不過，相對於低比率的生產量，青花瓷在元代窖藏中的頻頻出現，顯示出青花瓷憑藉著亮眼的藍彩裝飾，也成爲市場上具競爭力的新選擇。在此之後，青花瓷的產量才逐漸穩定地增加，而大量地、廣泛地使用青花瓷，則要等到青花瓷下一階段的發展。

(本文爲筆者於1999年6月在倫敦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舉辦的 "Prestigious Pots: Yuan Porcelain" Study Day所宣讀的稿子，感謝 Rose Kerr 女士的邀請。成稿期間經指導教授Dr. Jessica Rawson的細心指導，完稿後又承蒙Mary Tregear 女士、Shelagh Vainker女士及謝明良教授指正，並提供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

---

⑨⑨湖南常德出土兩件青花大盤，見古湘、陳柏泉，〈介紹幾件元、明青花瓷器〉，《文物》，1973年12期，頁64-65；高至喜，〈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瓶〉，《文物》，1976年9期，頁100-102。內蒙古出土一青花大盤，見A.T.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p.139, fig.90。

⑩⓪在景德鎮南河北岸發現的一座元代後期的殘窯，從遺物堆積中得知產品有卵白釉與青花器，而根據發掘者統計，青花殘器僅占總廢品的0.45%，見劉新園，白焜，〈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年11期，頁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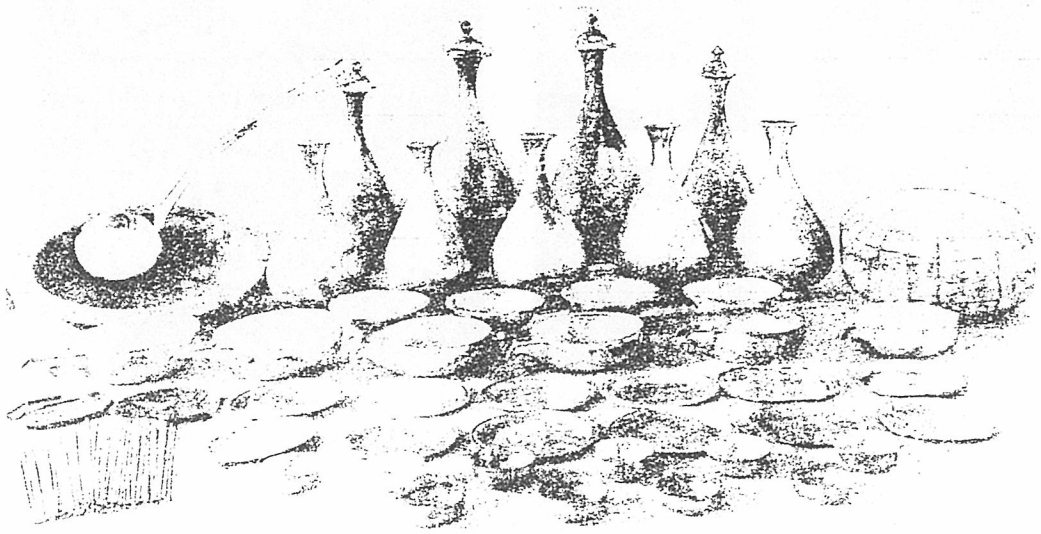


圖1　安徽合肥窖藏出土金銀器



圖2　金壇窖藏出土雲龍紋罐
（高 26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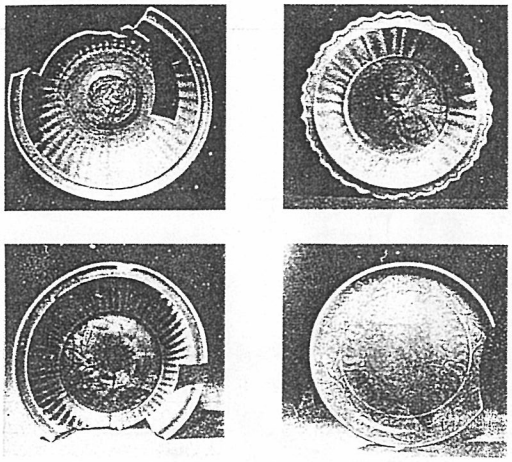


圖3　杭州窖藏出土青瓷盤(口徑33.4-3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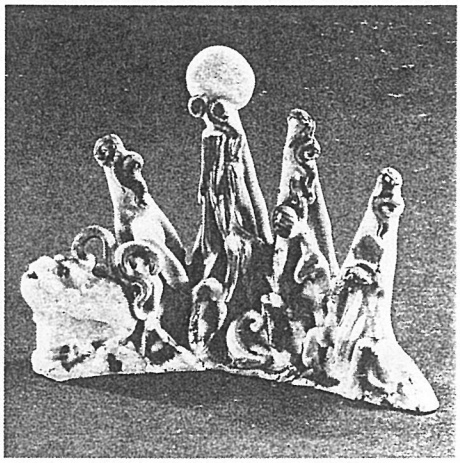


圖4　杭州窖藏出土青花瓷蛙形筆架水盂
(高8.9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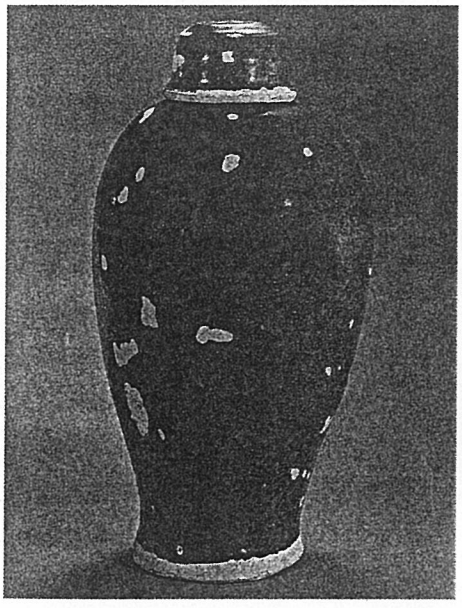


圖5　杭州窖藏出土孔雀藍釉「內府」銘梅瓶
(高3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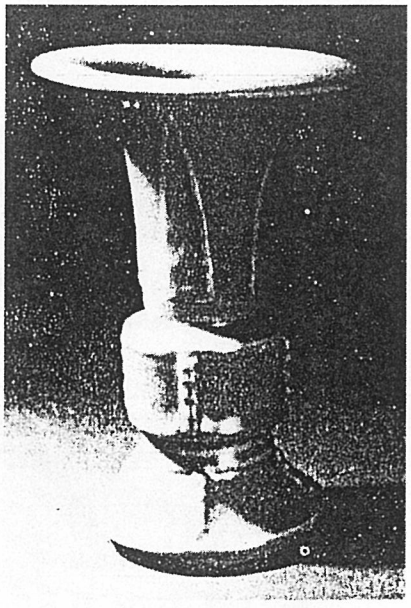


圖6　杭州窖藏出土青瓷觚(高20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　保定窖藏出土青花蓋罐(通高 41.2 公分)



圖 8　保定窖藏出土青花龍濤紋梅瓶
(通高 51.5 公分)



圖 9　保定窖藏出土青花八棱執壺
(通高.23.6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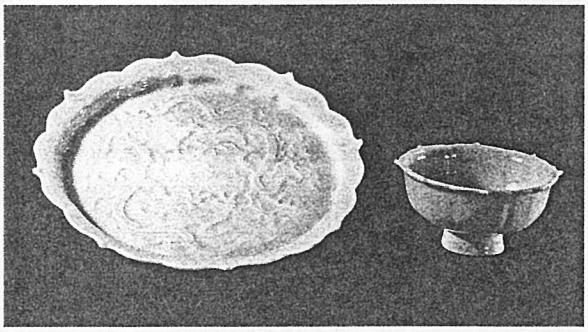


圖 10　保定窖藏出土樞府白瓷花口碟、杯
(碟：口徑 16.2 公分；杯：口徑 8.1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高安窖藏出土青花高足杯(口徑10公分)



圖12　高安窖藏出土青花龍紋梅瓶(通高48公分)



圖13　高安窖藏出土青花龍紋罐(通高36公分)



圖15　高安窖藏出土青花觚(通高16公分)



圖14　高安窖藏出土青花獸耳龍紋罐(通高38.2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　陝西長安縣唐代韋洞墓壁畫



圖 17　Pierre Paul Sevin，描繪在 Topkapi Saray 宮殿中爲波蘭大使設宴之情景，1679 年，National Museum, Cracow, Czartoryski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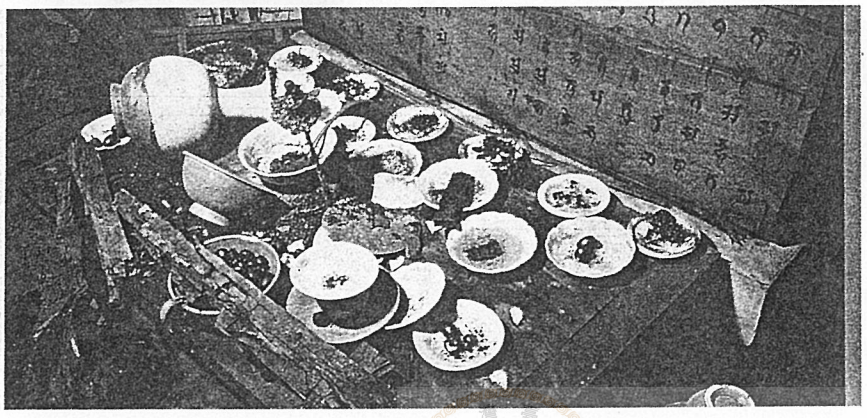


圖18　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壁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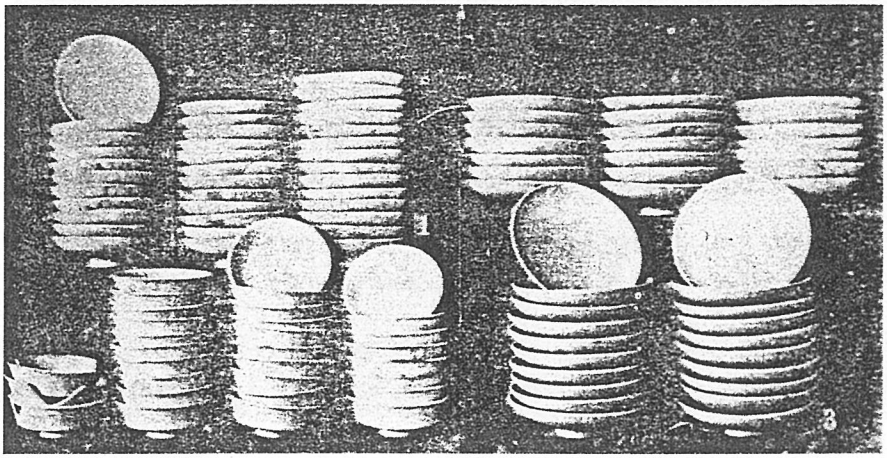


圖19　安徽歙縣醫藥公司基建工地出土窖藏瓷器



圖20　北京大都遺址出土青花碗
（口徑18公分；高9公分）



圖21　北京大都遺址出土青花杯、盞托
（總高18.4公分）



圖22　北京大都遺址出土青花鳳首執壺
（高15.3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3　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畫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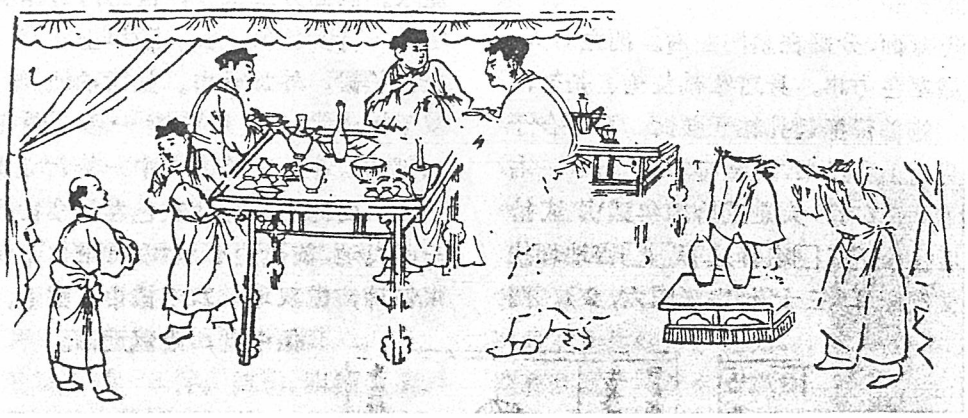


圖 24　遼寧朝陽金墓壁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5　山西廣勝寺水神廟壁畫



圖 26　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7 《事林廣記》前集卷 7，頁 61



圖 28　青花孔雀牡丹紋罐
（高 30.5 公分）　British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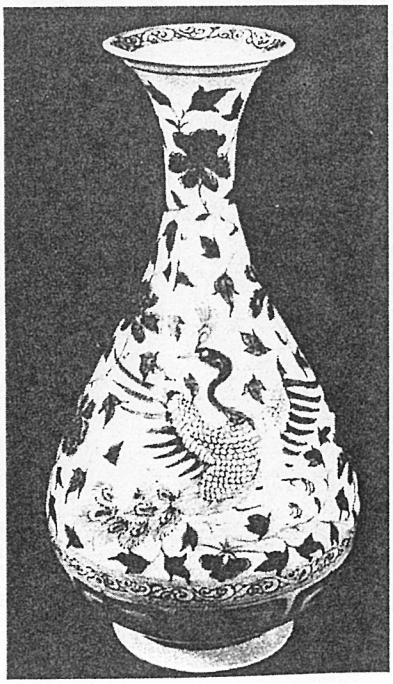


圖 29　青花孔雀牡丹紋玉壺春瓶
（高 29.5 公分）　內蒙古哲里木盟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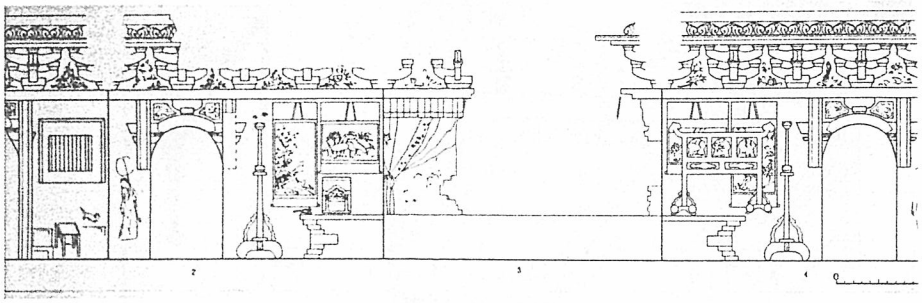


圖 30　洛陽邙山宋墓雕磚



148　青花 壺

高28.2cm　元　東京文化財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蔵

肩に、牡丹唐草、胴一カ所に魚藻、裾に蓮弁をめぐらした壺。元代の青花磁器の代表的作品の一つ。

水藻をくねらせて泳ぐ魚は、水辺に咲く蓮、水辺には蓮の葉、浮草などを描いた絵画は、水辺にはじまり、調和に満ちた構図にも意匠される。魚藻図と称され、本図のように器胎の景とされることもある。古来、瓶の器を飾るために壺が選ばれるまでは、器種数の多に限らず、割にもしばしば扱われている。

小田切がいう元画の源は、磁州窯系花鳥にはじまり、元の青花ではもわって魚藻的にあつかわれるかたちの図版は、明の官窯・新窯の魚藻図にそのまま継承されている。その波の中に蛍の尾はあって群魚を描きわけ、背びれの数まで、口中の舌、一つ一つの表現の特徴をあらわそうとする努力は、絵画と同様である。ことに造窯の能だけを描く、旧技きにして、濃墨で塗りつぶしてみられるのは、元時代以来伝統にもひろがった現出で、絵画的な表現と装飾的な配置が巧妙に調和した絵付けとなる。

主文の魚藻図を構図するために、筆法にやく細い鉄絵で簡単な表現がなされ、口から背鰭で簡略した時にはその見当と少しずれている。作図の過程が明らかになる興味深い遺品である。

圖 31　青花蓮池魚藻紋罐(高 28.2 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2　江西波陽元墓出土青花帶座梅瓶
（總高 23.4 公分）



圖 33　江西景德鎮出土戊子年(1348 年)銘青花罐
（高 10.5 公分）



圖 34　江西九江至正十一年墓(1351 年)
出土青花帶座香爐(高 9.8 公分)



圖 35　江西景德鎮出土青花帶蓋香爐
(總高15.5公分)景德鎮陶瓷館



圖 36　杭州後至元丙子年墓（1336）
出土青花、鐵繪觀音
（總高 19.5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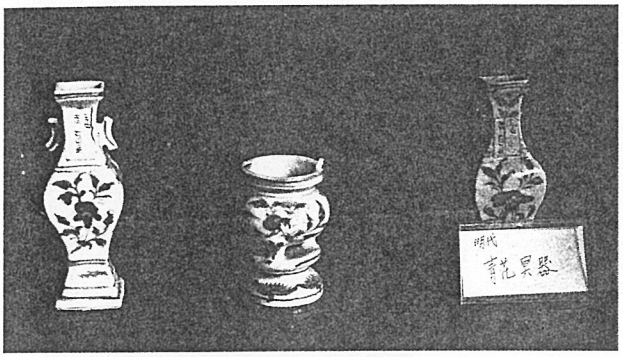


圖37　景德鎮明代墓葬出土青花香爐、花瓶
（約高3-5公分）　景德鎮陶瓷歷史博物館



圖38　江西萍鄉窖藏出土青花帶座瓶
（瓶高15公分；座高7.5公分）



圖39　正十一年(1351年)銘青花雲龍紋瓶
倫敦大衛德基金會(高63.6公分)



圖40　甘肅汪世顯家族
墓出土黑陶瓶
（高28公分）



圖41　青花龍紋帶耳瓶
（高67公分）
Musée Guimet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 42　四川三台窖藏出土青花帶耳瓶
（高 27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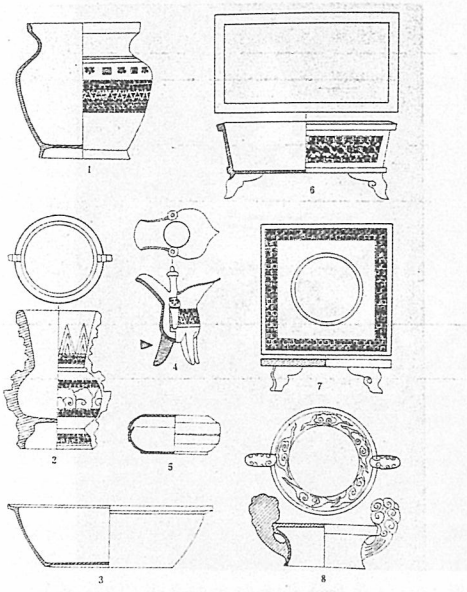


圖 44　洛陽元代賽因赤答忽墓(1365 年)黑陶器



圖 43　四川三台窖藏出土青花香爐(高 14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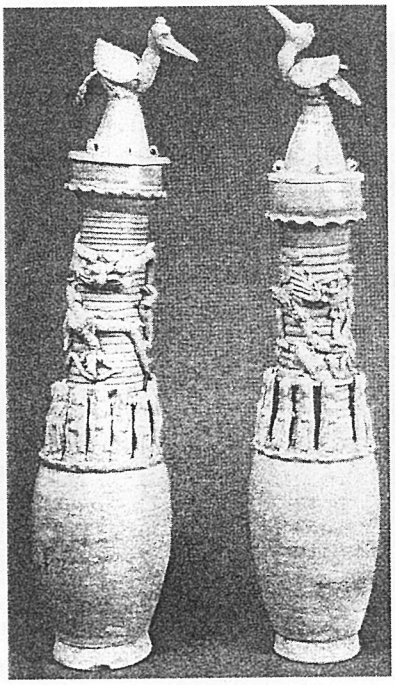


圖 45　江西南昌嘉定二年墓(1209 年)
出土日月瓶（通高 70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46　江西景德鎮後至元四年墓(1338年)出土青花釉裏紅四神罐(通高22公分)



圖47　江西景德鎮後至元四年墓(1338年)出土青花釉裏紅穀倉模型(通高29.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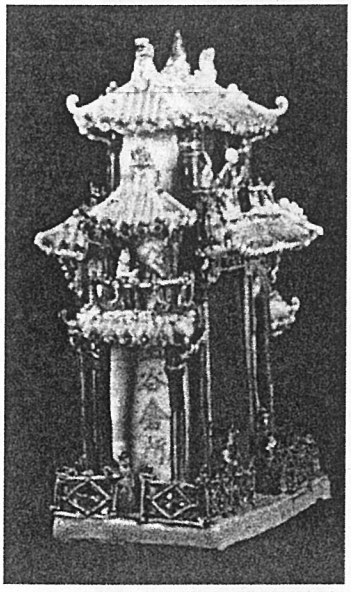


圖48　江西景德鎮後至元四年墓(1338年)出土青花釉裏紅穀倉模型細部



圖49　湖北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青花(或鐵繪)塔式蓋罐(通高42.2公分)九江市博物館



圖50　元代青白瓷貼塑人物蓋罐景德鎮陶瓷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1　南京沐英墓(1392 年)出土青花人物故事紋梅瓶(高 44.1 公分)
南京市博物館



圖 52　安徽蚌埠湯和墓(1395 年)
出土青花獸耳蓋罐(通高 47.5 公分)



圖53　江蘇江寧縣孫家山安成公主墓(1443年)
出土釉裏紅梅瓶（通高 41.6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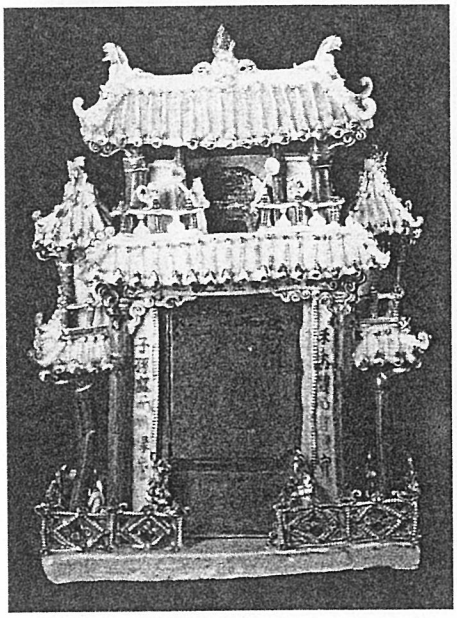


圖 54　江西景德鎮後至元四年墓(1338 年)
出土青花釉裏紅穀倉模型細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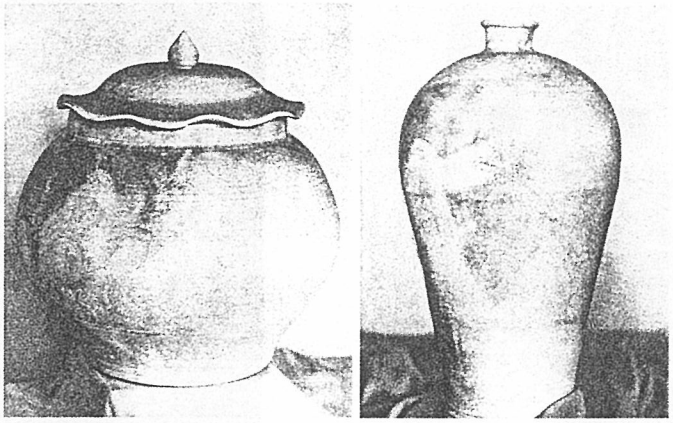


圖55　山東朱檀墓(1389年)出土白瓷梅瓶、大罐
(梅瓶高34公分；罐高3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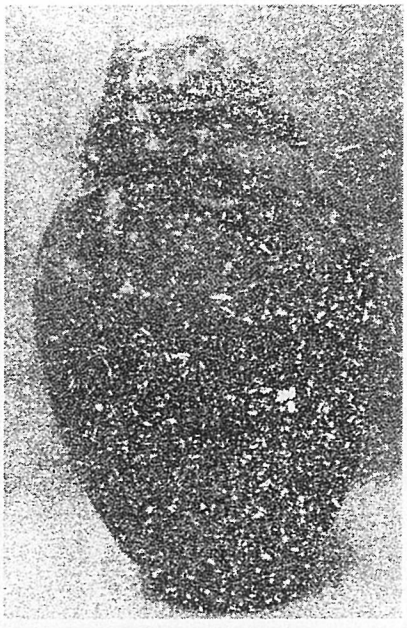


圖56　安徽馬紹庭夫婦合葬墓(1118年)
出土低溫釉陶帶蓋罐(高3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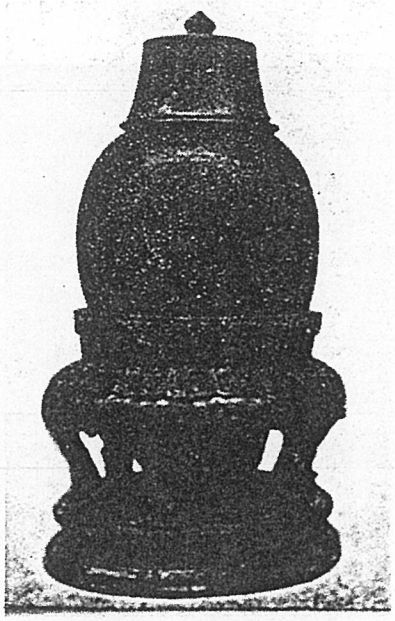


圖57　四川成都白馬寺六號墓(1510年)
出土黑陶帶蓋梅瓶(通高37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8　明定陵出土「大明萬曆年製」銘
青花梅瓶(通高約 71.2-74.9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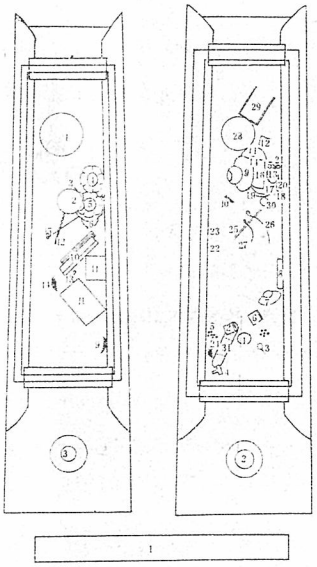


圖 59　安徽馬紹庭夫婦合葬墓
(1118 年)墓室平面圖



圖 60　江西瑞昌南宋墓(1257 年)
出土釉下鐵繪梅瓶(高 52.3-52.5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